



官方微信二维码



智库微信二维码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客观、科学的观点。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21年
1-3月

- ▶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在我院发布
- ▶ 我院顺利举办“2020 广东千村调查报告发布会暨乡村振兴学术论坛”
- ▶ 我院两篇论文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接受发表
- ▶ 我院荣获 2020 年度“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与合作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是暨南大学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 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 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 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2 月, 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 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 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 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 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劳动经济学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 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 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 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相关政策研究, 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 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 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 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流动儿童蓝皮书: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 (2019~2020)》在我院发布	02
	我院荣获 2020 年度“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与合作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03
	我院 2021 年度教师招聘工作顺利推进	05
	我院顺利完成 2020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	06
	我院举办学生培养与教学工作座谈会	09
	我院新学期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0
02	科研动态	
	科研项目	13
	论文发表	13
03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15
	大师暨南行	18
04	思想聚焦	
	乡村振兴专题	20
	家庭经济专题	37
	媒体聚焦	45
	暨济一堂	53
05	数据调查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64
06	学生天地	
	学子风采	70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77
07	图说	
	佛山贤鲁岛团建	80

学院 要闻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在我院发布



2021年1月11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编写、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韩嘉玲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简称“报告”）在穗发布。本次发布会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该书作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教育公益人士和媒体人等围绕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儿童教育现状和趋势，共同展开了研讨交流。

此次发布会共设五大主旨演讲，并重点结合广东珠三角地区流动儿童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讨论。《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权威媒体也关注和报道了该书发布会。

据介绍，《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力图呈现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可行的解决路径，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生存现状、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政策等问题，呈现了流动儿童教育的现状，比较了各地政策的友好程度差异，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特别关注了回流儿童、再迁儿童等儿童群体的教育，并通过对地方案例和社会力量的教育实践的梳理，展现了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新动态。



我院荣获 2020 年度“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与合作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21年1月12日上午，2020年度暨南大学国际及港澳台侨工作总结与表彰会议于校友楼会议厅举行，我院荣获“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与合作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我院外事秘书邱湘燕亦荣获“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与合作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我院自2015年12月成立以来，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活动等方面都遵循国际高标准，在学校领导及国际交流合作处各个部处的支持下，全方位开展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合作。

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自建院以来，研究院已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境外著名高校引进了37名优秀海归博士，境外优秀人才比例高达90%。同时，研究院根据自身学科规律制定了对标国际的评聘机制与考评标准，使得教师在学术

论文、科学项目研究等各方面都必须遵循高要求高标准，产出对标国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我院外事秘书邱湘燕（左六）接受
国际交流工作先进个人表彰

研究院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特聘教授等方式引进一大批海外学术大师，其中就包括受聘为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的James J. Heckman教授。2019年，Heckman教授经暨南大学推荐，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并作为获奖

代表发言，这正是研究院在柔性引进海外顶尖人才方面所做努力的最佳证明。此外，我院先后成立了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等五大研究中心，聘请了海外高校著名教授担任中心主任。中心主任在人才引进、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助力我院提升学科实力。

国际化的人才培养

研究院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既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又熟悉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优秀人才。研究院利用国际化师资团队进行人才培养，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借鉴北美一流经济学教育模式，实行全英文教学、本科导师制、小班精英化培养等模式。

首届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毕业生中，有95%的学生选择继续升学深造，70%拿到了境外知名高校录取通知书，其中2名本科毕业生分别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系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博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首届硕士研究生于2020年毕业，50%选择继续升学深造，37.5%拿到境外知名高校经济学博士项目录取通知书，其中2名同学分别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全奖博士项目的录取。

国际化的学术活动

我院积极推进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近三年，我院累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共14场，境外来访超100人次。其中部分境外嘉宾与我院交流密切，例如，Heckman教授5年来曾五次来访暨大，为暨大师生带来了“大师暨南行”系列活动，并与我院教师进行深入的面对面沟通。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交流严重受阻，我院积极探索国际交流新模式，开展线上学术活动。本年度我院共举办线上及线下大师暨南行、问政暨南、IESR+、seminar等学术讲座113场，超过60%的学术讲座采取腾讯会议、zoom会议等线上举办的形式，邀请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悉尼大学、神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国

内外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100余名来访我院或云端开展学术讲座。本年度，我院将高端系列学术讲座“大师暨南行”转为线上讲座，2020年共举办4场，邀请了Edward Glaeser, Greg Kaplan, Michael Oppenheimer, Chang-Tai Hsieh等4位国际知名教授在线上开讲，共计吸引线上听众超千名。

此外，本年度共举办4场国际学术会议，其中Third IESR-GLO Joint Conference、第二届计量经济学训练营、“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政策论坛为线上活动，吸引大量海内外学者线上参会；2020现代劳动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则为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利用网络平台，将线上及线下参会者连线互动，效果受到参会者一致好评。

疫情面前，我院并未停下国际交流的脚步，及时调整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克服困难，大力支持线上学术活动的开展，将疫情带来的挑战化为机遇。通过利用互联网及线上会议平台的便捷，我院将学术平台的受众进一步扩大，力争进一步提高我校经济学科在海内外学者及相关学术圈的知名度。

我院在成立之初便设立了国际化研究院的发展目标，并一直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活动等各个方面发挥国际交流的优势，此次荣获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与合作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表彰，是学校对我院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极大肯定。今后，我院将会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建设，为擦亮暨南大学的金字招牌贡献一份力量！

我院 2021 年度教师招聘工作顺利推进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2021 年度教师海外招聘工作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启动。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我院共收到近 300 份申请材料，吸引了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著名境外高校的申请者。申请者的主要研究方向涵盖了劳动、卫生、教育、环境、城市、区域、房地产、宏观、公司金融、计量、产业组织、贸易等经济学各领域。

我院自 2016 年起便直接进入国际人才市场招聘海外人才，利用美国经济学年会成熟的人才市场和招聘渠道，参照北美高校通行的招聘程序进行严格选拔。结合疫情防控因素，我院本年度招聘工作主要通过“线上”

形式进行，分领域有序开展材料筛选、线上面试、线上访问等工作。

秉承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引人理念，近年来我院一直大力延揽海外人才，同时在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以实现“引得进，留得住，能成长”的三位一体人才管理目标。学院通过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与国际接轨的人才管理模式，以及打造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等方式，为教师的成长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我院顺利完成 2020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

2017 年 9 月，我院成为暨南大学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单位，获得了职称评定、评聘的高度自主权。研究院对教师实行准聘长聘制，其中包含助理教授、副教授、长聘副教授、正教授四个职级。每年，符合条件的教师可以向研究院提出升职申请。初审合格后，申请人材料将送交国内外同领域专家，进行同行评议。之后，由研究院教师及院外专家组成职称晋升评审委员

会，综合考虑申请人各方面情况，形成推荐意见，交由学院学术委员会作最终决定，最后报送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截至目前，我院已完成 4 年职称自主评审工作，其中 1 人被评为正教授，4 人被评为长聘副教授，10 人被晋升为非长聘副教授。



徐吉良

正教授
(Full Professor)

工作经历

2020/10- 至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正教授
2018/10-2020/9，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2016/9 -2018/9，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2014/9 - 2016/8，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教授
2013/8-2014/8，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助理教授
2009/8 - 2013/7，台湾中正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教育情况

2009 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4 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1998 年获得台湾清华大学数学硕士学位
1996 年获得台湾清华大学数学学士学位

研究领域

微观计量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

学术成果

先后在 Journal of Econometrics、Econometric Theory、Econometrics Journal 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近二十篇高质量文章；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史 炜

副院长、长聘副教授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工作经历

2020/10- 至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2017/10-2020/09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2016/07-2017/09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教育情况

2016 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2 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1 年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 / 定量金融学学士学位

研究领域

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学术成果

先后在 Journal of Econometr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近十篇高质量文章；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



唐 立 鑫

长聘副教授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工作经历

2020/10- 至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2018/07-2020/09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2015/09-2018/06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

教育情况

2015 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0 年获得美国贝茨学院经济学 / 物理与数学学士学位

研究领域

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学术成果

先后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管理世界》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多篇高质量文章；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项。



薄诗雨，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于 2016 年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等国际权威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崔潇濛，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于 2018 年获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独立作者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等国际权威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李书娟，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政策研究轨），于 2015 年获得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为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国内经济学权威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苏应俊，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于 2017 年获得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等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王武毅，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于 2018 年获得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Econometrics、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Economics Letters、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等国际知名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我院举办学生培养与教学工作座谈会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院学生培养的质量,加强我院教学工作的管理,研究院于1月22日下午在中惠楼106会议室举办学生培养与教学工作座谈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以及我院本硕博各年级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导师共计30余名老师通过线上或线下的形式出席本次座谈会。座谈会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史炜副教授主持。

首先,史炜作本年度教务工作总结报告。史炜汇报了2020年度我院在学生思政工作、招生工作、课程安排、学生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并部署了寒假期间学生防疫等各项安全工作,以及安排了下学期的教务工作计划。



史炜副院长作2020年教务工作总结报告

紧接着,冯帅章就研究院本硕博学生培养、教学管理等工作提出了改进建议,并希望各位教师能够既做好科研,又带好学生,做到“教”与“研”互相促进。冯帅章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他表示,本次座谈会旨在为我院教师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与学习教学经验的平台,希望各位教师可以在交流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冯帅章院长发言

之后,与会教师对本学年的教学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分别就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招生及培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老师们还探讨了在当前疫情及国际形势下,我院如何通过调整相关工作来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对学生就业产生的影响。此外,老师们也对研究院教务团队相关工作的改进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座谈会现场

本次座谈会对于进一步提升我院在学生培养与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院教务团队也将认真落实各项指导意见,并稳步推进各项改进工作。

我院新学期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谢斌老师授课

新学期已至,同学们带着对新学期的期待与展望,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在学校新冠疫情防控方针的指导下,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于开学前一周就投入紧张的协调工作,确保此次返校的顺利进行。至此,共有164位本科生、研究生与博士生陆续返回暨南园。

假期期间,老师和同学们都度过了充实的生活。有的同学进行了自己的第一份实习,有的则居家认真学习。而IESR的不少老师仍挂念着自己的研究进度,寒假期间依旧留校工作,为产出研究成果而默默耕耘。

新学期,新课堂

伴随着开学的第一声铃响,同学们又返回到熟悉的课堂。

“感觉IESR每一位老师的授课方式都能带给我全新的体验,”2019级学生王欣盼说起开学第一周的课堂感受,首先提及的是各位授课老师的教学魅力。“我被谢斌老师的儒雅深深吸引。殷立娟老师讲述中级宏观经济学时激昂澎湃,而教授Python课的严子中老师则是娓娓道来。期待接下来能跟大家一起认真学习各门课程。”



同学们认真听课

2020 级学生韩伟琪对新学期的课程也怀揣着兴奋与期待。对比刚踏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学期，韩伟琪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满意的课表，喜欢的课程与合理的时间安排，让她拥有能进行自我探索的时间。

本学期，韩伟琪将学习专业课《数学分析 2》和《宏观经济学》，对此，她感到非常兴奋，“这学期学的知识更精深了，凝视着全新的教材，我已经心动的不行啦……翻《宏观经济学》教材看到了好多假期做 RA 时见过的指标，恨不得一节课把教材啃完。”

新学期，新展望

不少同学都做好了新规划。2018 级的李云昊同学希望新的学期可以在完成课堂作业的同时，保持好的作息规律和生活习惯，按照自己的规划踏踏实实地把计划落到实处，度过一个充实的学期。2020 级学生陈瀚瀚新学期的首位目标是绩点冲击 4.0，在学习上调整节奏，避免松紧过度，保持长期学习状态。同时，他还希望能够认识更多的人，认识更多在同路前行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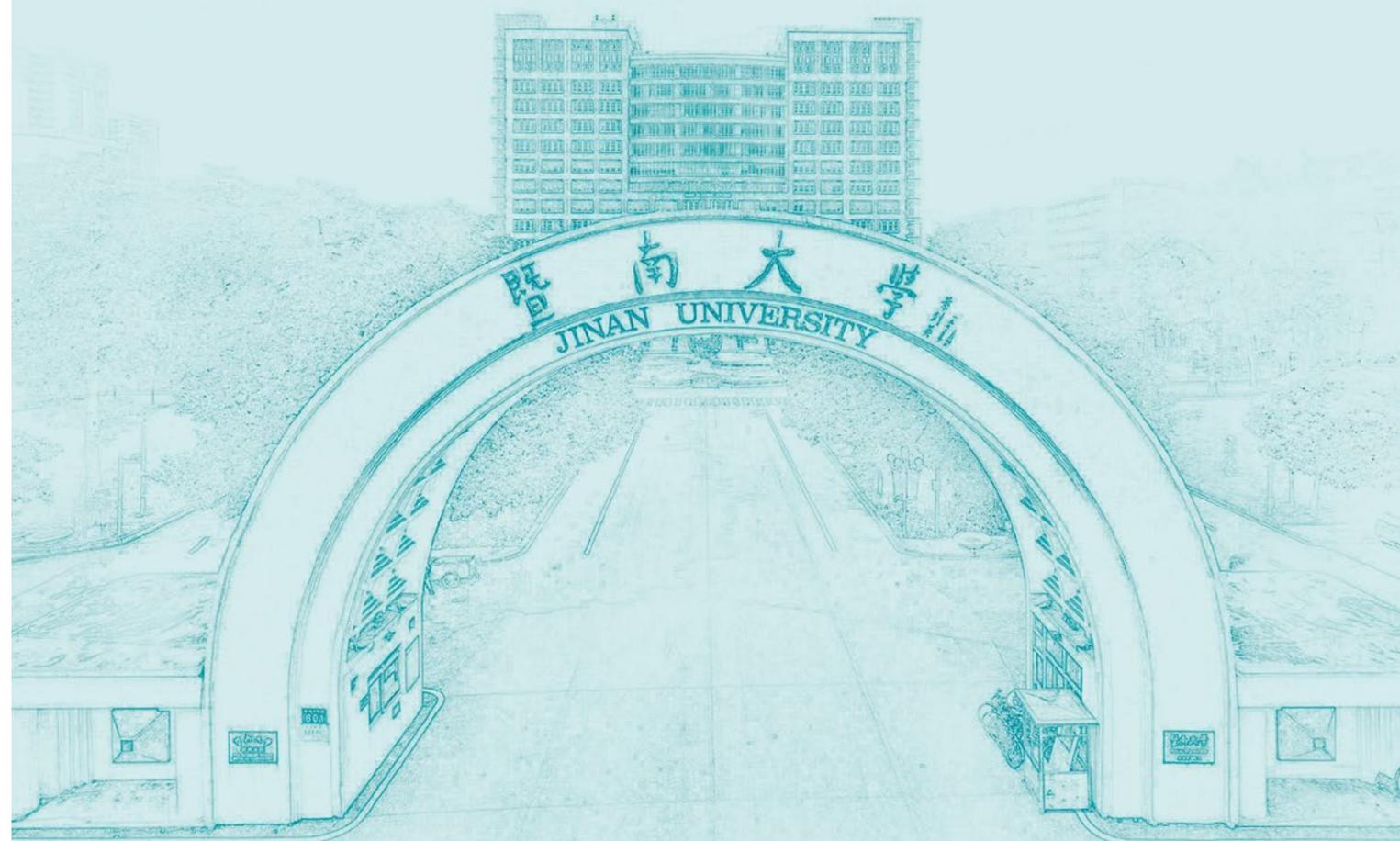
新学期，新规划

在同学们展望新学期的同时，IESR 教务人员与行政人员也开启春季学期的工作。3 月 1 日，IESR 教务组召开统筹会议。为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学与学位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IESR 将继续夯实组织领导，确保线上、线下教学与学位工作有序推进。同时，有序开展教学工作，确保教学要求不放松、教学标准不降低。

同时，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IESR 开启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提升计划，从学位论文查重、预审查 / 预答辩、评阅、答辩、修改等方面入手，按步骤、全流程把关学位论文质量。

同日，行政组亦召开会议，对本学期的学术讲座、学术论坛、研讨会等学术活动进行讨论与规划。上学期，IESR 开展的大师暨南行系列公开讲座、广东千村调查报告发布会暨乡村振兴学术论坛、海外名校硕士宣讲会等活动，受到同学们一致好评。这学期，行政组将继续以高质量为标准，为各位师生提供更好的资源与服务。

科研动态



科研项目

我院联合经济学院成功举办国家科研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

为切实做好 2021 年度国家科研项目申报工作，进一步提高学院国家科研项目申报质量，2021 年 1 月 17 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联合经济学院共同举办 2021 年度国家自科项目申请线上经验交流会。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陈亮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瑞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汪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勋副教授受邀参加此次经验交流会，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师们一同交流探讨国家科研项目申请工作。

会议伊始，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副教授首先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与感谢，随后介绍了国家级科研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的会议背景以及过去历年国家科研项目申报立项概况。

本次交流会分主题演讲与报告点评两个环节进行，在主题演讲环节，邢春冰教授享了他在国家科研项目申报中的成功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教授分享自科项目申请经验

在接下来的报告点评环节中，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与经济学院的青年教师分别汇报了各自的项目申请计划，并与嘉宾展开深入的交流，切实解决项目申请过程中所出现的难点问题。

一直以来，学院高度重视国家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多次召开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为 IESR 的教师搭建一个高质量的信息交流平台，且成效明显，近年来国家科研项目立项数量稳中有升，在研项目数量逐年增多。

论文发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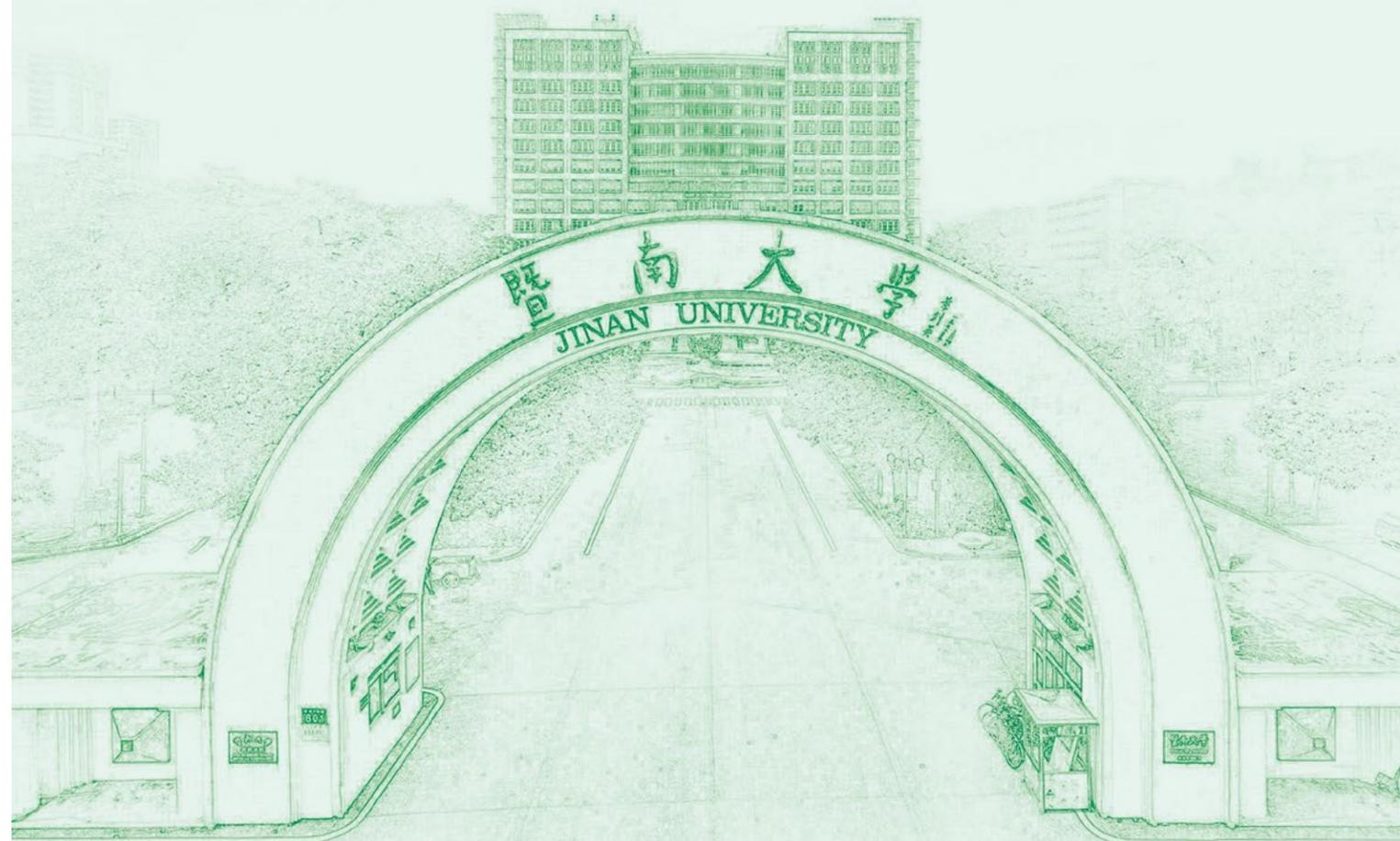
我院助理教授薛森的合作论文“Can information influence the 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 of China's rural migrants?”(合作者 John Giles, Xin Meng, Guochang Zhao) 被发展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受发表。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我院副教授薄诗雨的合作论文“Inter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under decentralization” (合作者: Liuchun Deng, Yufeng Sun, Boqun Wang) 被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接受发表。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我院顺利举办“2020 广东千村调查报告发布会暨乡村振兴学术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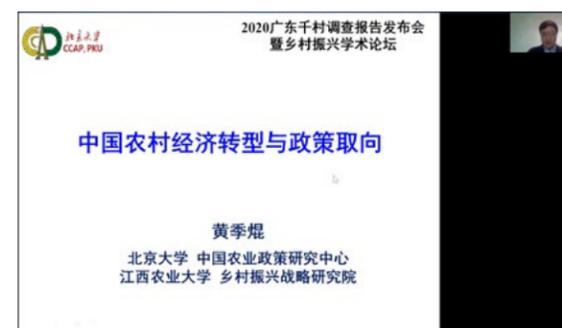


2021年1月16日，我院举办了“2020广东千村调查报告发布会暨乡村振兴学术论坛”。论坛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线上和线下与会者共计近300人。

论坛伊始，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为本次论坛致辞。冯帅章表示，我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和省委号召，积极投身广东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从2018年起，我们已经连续3年开展了“广东千村调查”。他提到，为了更好地服务广东乡村振兴工作，助力广东乡村振兴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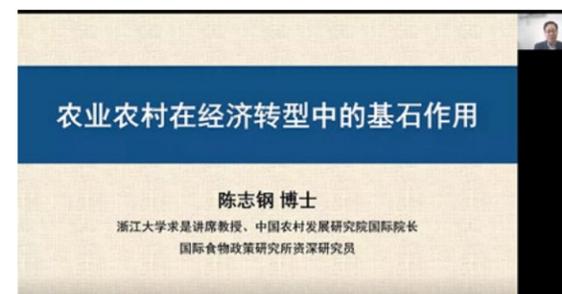
在全国前列，在广东千村调查的前期基础上，我校拟整合全校优势力量，成立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组建高水平专职研究与调查队伍，打造高水平的乡村振兴学术交流平台。

接下来，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作了题为“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政策取向”的主旨报告，分析了农村转型与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关系，指出未来农业将逐渐向高效高质多功能的高值农业与永续发展方向转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黄季焜教授线上作主旨报告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陈志钢作了题为“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在经济转型中的基石作用”的主旨报告，指出农业具有非常高的韧性，农业-食物系统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农村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基石作用。



陈志钢教授线上作主旨报告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罗必良作了题为“乡村振兴的可能性线索”的主旨报告，分享了对于乡村“五大振兴”的深刻理解，以文化振兴为例，探讨了如何将具有公共品质性和外部性的农村产品进行市场化交易的核心难题。



罗必良教授现场作主旨报告

主旨演讲之后，2020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正式发布。“广东千村调查”（Thousand-Village Survey in Guangdong）项目是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与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全省性调查项目，其目的是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户调研，目前已开展2018、2019、2020年三轮调查。

首先，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介绍了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执行情况。2020年广东千村调查采集的有效样本量为119个行政村，3646户农村家庭户。调查中心采用录音核查、电话核查、数据核查、图片核查及GPS地理信息核查等多种手段进行质量控制，全面、有效地保障了调查的数据质量。随后，暨南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卢晶亮、韩昱洁、李书娟、李承政、唐高洁分别介绍了《广东千村调查2020年研究报告》的主要发现。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唐高洁介绍了关于精准扶贫的情况。调查发现，2019年广东省农村的脱贫率有明显的上升，脱贫户大多脱贫不脱策，且返贫率低。在扶贫资金方面，村庄整体扶贫资金充足，但部分地区扶贫资金的阳光透明仍需推进。另外各村各项扶贫项目的开展比例很高，但是部分扶贫项目的贫困户参与率却很低，广东省仍需要鼓励贫困户提高对扶贫项目的参与度。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卢晶亮介绍了关于农村家庭就业与收支的情况。报告指出，2020年广东省农村16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比例为54.75%，粤东西和山区的劳动力向珠三角集聚的趋势明显。广东农村劳动力就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和增速都明显高于本地务工。广东农户家庭收入持续增长，依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上升，但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值得关注。广东农户消费结构持续改善，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加。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李承政介绍了关于农地、宅基地确权与农地流转的情况。调查发现，广东省基本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有承包地的农村家庭户均耕地面积为3.54亩，户均确权地数为7块。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颁证率仍较低，下一步需要加大力度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确保完成“一户一宅”为基础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方面，总体而言，广东省农地流转发生率不高，农地转出率为20.35%，转入率为7.77%。

李承政接着介绍了农村人居环境方面的情况。综合来看，广东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投入大，相关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明显。广东省基本做到村村有垃圾收集点，垃圾运输与处理体系基本实现全面覆盖。2020年，广东农村加快生活污水排放管道的建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提高，超额完成《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目标。“厕所革命”成效明显，村庄公共卫生厕所比例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仍有一些工作需要继续推进，一是“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二是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三是改善村民生活污水排放方式工作。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韩昱洁介绍了乡村教育方面的发现，包括农村各阶段教育机构的概况，农村居民的教育情况，农村幼儿教育重点需要关注的儿童的情况。分析发现，广东农村几乎九成的村都是有小学的，且户籍儿童小学阶段对口本村学校以及就近入学情况较好。2020年各年龄阶段的农村儿童在校率几乎都稳定在较高水平。随着就读学校阶段的提高，广东省农村儿童的住校率在逐步提高。2020年的留守儿童百分比为46.79%，山区各教育阶段的留守学生占比普遍高于其他地区。

韩昱洁接着介绍了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和弱势群体关爱方面的情况。总体来看，地区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缴纳比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对于现有医疗保障制度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村干部认为问题主要集中于缴费率过高、报销比率低以及公平性不够三个方面。对于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村干部认为主要是养老金较低、体制有待完善、个人养老保险缴纳负担重，以及资金筹措

困难几个方面。关于留守老人的关爱保护，虽然绝大多数村规民约中涉及有老年人的关爱服务内容，但只有不到40%的村庄会对留守老人群体进行定期巡访。妇女关爱方面，全省农村妇女进行两癌筛查的比例还处在较低水平。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李书娟介绍了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广东省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组织保障基本到位，但经费保障情况不太乐观，而且村民对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知晓度普遍不高。在清产核资方面，全省农村集体资产以资源性资产为主，村集体资产产生的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方面，广东省内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新途径的情况较好，治理机构设置合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股份量化及股权设置等工作陆续全面铺开。

李书娟接着介绍了乡村治理的情况，分析发现，广东省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工作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得到村民的普遍肯定。当前，农村矛盾纠纷现象在全省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依赖于农村基层村干部调解。数据显示，全省村干部与村民保持较高频次的沟通，村民也基本认可村干部在化解农村纠纷、维护村民利益、引领村庄发展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的传播及其防控工作的开展对全省农业生产、外出务工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全省绝大多数农村在防疫防控、复工复产工作上举措到位。

1月16日下午，会议进入到“乡村振兴学术论坛”环节。本次论坛共设有三个平行论坛，参会者分别围绕“资源、环境与疫情影响”、“乡村治理”、“教育、金融、扶贫与收入增长”三个主题进行学术论文报告。

大师暨南行

斯坦福大学 Scott Rozelle 教授线上讲座顺利举行



Scott Rozelle教授与冯帅章院长

北京时间2020年3月11日9点，斯坦福大学 Scott Rozelle 教授受我院“大师暨南行”活动邀请，于线上平台进行了题为“Rural China's Human Capital and Challenges to the Economy's Long-term Stability Growth”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由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会议吸引了超过300位参会人员。

Scott Rozelle 教授是斯坦福大学 Helen Farnsworth 的高级成员，也是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项目 (REAP) 的共同负责人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 (Science)》、《自然 (Nature)》和《美国经济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国际顶级期刊。2008年，Rozelle 教授获得了中国政府授予国际友人的最高奖项“友谊奖” (Friendship Award)。

在讲座中，Rozelle 教授从农村人力资本发展的角度讨论中国长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他首先描述了地区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然后解释人力资本积累不平等的原因；最后，针对解决中国城乡人力资本积累不平等的问题，Rozelle 教授提出了相应建议。

Points of Today's Talk

-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 What is (part of) the "problem"?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 What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low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Case study of China
- Can anything be done?



线上讲座

讲座最后，Rozelle 教授与参会人员积极互动，讲座气氛热烈。此外，教授还与我院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详细了解了我院教师的研究，回答了针对他们研究的相关问题。参会人员都表示此次讲座受益匪浅，为他们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启迪。

乡村振兴专题

思想聚焦

超七成农村劳动力没有签劳动合同

作者：卢晶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葛梦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仅有15.08%的农村雇员签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从广东农村雇员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看，全省仅有15.08%的广东农村雇员签订了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75.27%没有合同。珠三角地区的广东农村劳动力签订合同比例最高，约30%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60%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东翼地区未签订任何合同的比例最高，达到87.59%。

基于2019年和2020年的面板数据显示，全省农村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略有上升，由23.16%上升至25.35%，说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范性有所提高。

广东农村劳动力雇员劳动合同情况（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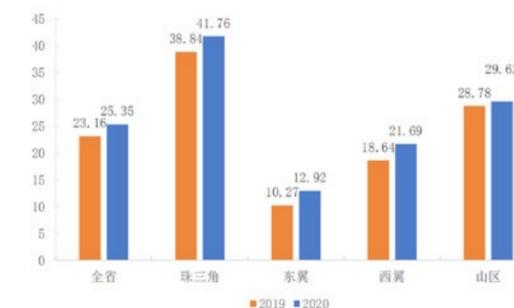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无固定期限合同（固定编制）	4.42	6.46	3.69	3.22	4.76
有固定期限合同	15.08	29.07	6.29	11.32	17.59
短期或临时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	5.23	5.34	2.43	7.21	6.88
没有合同	75.27	59.13	87.59	78.25	70.77
样本规模	3574	805	1112	901	756

对比广东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本地务工劳动力个人特征的差异发现，与本地务工相比，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男性占比更高，达到70.14%；已婚比例更低，劳动力平均年龄更年轻，16-34岁占比高达64.52%。学历也更高，但仍然以初中、高中学历为主，初中和高中学历水平占比达到72.65%，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2.46%。

从劳动力外出务工工作区域的分布看，2019年广东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69.36%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工作，在东翼、西翼、山区工作的比例只有9.84%、9.67%和7.22%。分流出地看，92.72%的珠三角农村外出劳动力

都集中在珠三角务工，西翼和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分别有62.90%和72.29%前往珠三角务工。东翼农村外出劳动力有37.73%在东翼地区务工，58.04%前往珠三角地区务工。

可见，珠三角非农就业机会丰富，本地农村劳动力基本都就近务工，东翼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和前往珠三角务工的比例接近6:4。而对于西翼和山区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缺乏吸引力，约70%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前往珠三角地区务工。



广东农村雇员劳动合同情况 (%)

注：数据来源于2019和2020年广东千村调查面板数据，样本量为2849人

珠三角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最高

从2019年广东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本地务工劳动力的平均工作月数和月平均工资。2019年，广东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外出务工9.97个月，月平均工资4186.60元；本地务工劳动力平均工作9.05个月，月平均工资2976.17元。

分来源地来看，每个地区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都要高于本地务工工资收入。珠三角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最高，达到4462.55元；珠三角本地务工的平均月工资也最高，为3119.83元；东翼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最低，为4000.07元；本地务工的平均工资也最低，仅为2766.78元。

男性的平均工作时间略低于女性，工资收入高于女性。本地务工男性比女性工资高45.60%；外出务工男性比女性工资高16.74%。外出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和收入都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而上升。分行业来看，高等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最高，初等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最低。

按工作地分，省外务工的平均工资最高（5773.53元），省内跨县务工的平均工资次之（4151.54元），在县内务工的平均工资最低（3877.62元）。最后，省内在西翼务工的平均工资最高（4147.10元）。

我们将农户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等分为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考察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情况及构成，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94.61元，中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55.07元，中等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976.19元，中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219.11元，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268.37元。从收入构成来看，收入越高的家庭工资性收入的占比越高，转移性收入的占比越低。

从农户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及构成看，全省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为13000.58元，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为5703.73元，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342.83元，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为1437.76元，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为848.84元，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为1482.79元，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1175.89元，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为1894.69元，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为114.05元。

关于就业的四个建议

根据千村调查的结果，我们对广东省的就业及收支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警惕广东农村地区就业率下降的趋势，确保农村劳动力就业稳定。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增大。与城镇地区的失业统计不同，农村地区的失业具有隐蔽性，容易被忽略。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人群中有相当比例是毕业却待业的学生，值得特别关注。政府应做好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失业统计工作，做好就业帮扶，确保就业稳定。

第二，粤东北劳动力向珠三角集聚的趋势明显，劳动力就近就业的比例有待提高。数据显示，粤东北地区尤其是西翼和山区的农村劳动力超过80%前往珠三角地区务工。

农村人口进城后的稳定就业是城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缺乏就近的非农工作机会，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翼和山区城镇化率偏低。受新冠疫情影响，粤东北劳动力前往珠三角务工明显受阻。短期内，政府应该做好粤东北劳动力就近非农就业的工作，降低

疫情对农民工的收入负面影响。长期来看，应该进一步发挥粤东北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吸引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第三，加强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数据显示，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广东省农户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受访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超过60%。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受外出农村劳动力知识和技能的制约，如果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未来进一步持续提高农村家庭收入的难度较大。同时，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这一过程中技能落伍的劳动者面临着转业转岗，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难以避免。因此应发挥公共就业服务部门的作用，关注对农民的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平台，完善对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和劳务需求信息库建设。同时，应

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加强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

第四，农村劳动力缺乏劳动合同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正规性有待提高。数据显示，在那些受雇的农村劳动力中，广东省全省仅有24.3%的雇员签订了劳动合同。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他们一般多为低技能劳动者，劳动报酬较低，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完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农村

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发展状况至关重要，实现农村转移劳动力体面劳动还需要在劳动合同、参保渠道等方面探索新的设计和办法。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

村庄平均彩礼2.66万元，嫁妆1.46万

作者：唐高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张亚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从农户家庭情况来看，农业户口居民占绝大多数，8%的居民过去半年内一直不在本户居住，值得一提的是，农村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仅为23.01%。婚嫁彩礼情况方面，全省30岁以上单身男性的比例为5.2%，平均每村有三位外（国）籍妻子，村庄平均彩礼价格为2.66万元，嫁妆平均价格为1.46万元。

表1 村庄婚嫁和彩礼状况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30岁以上单身男性（%）	4.83	5.01	1.14	7.01	6.37
30岁以上从未结过婚的男性 ² （%）	3.34	3.45	0.71	4.66	4.61
本村彩礼平均价格（万元）	2.58	2.01	3.22	2.00	2.85
本村嫁妆平均价格（万元）	2.42	2.00	2.44	2.29	2.81

从个人样本的婚姻状况来看，全省70.37%的农村居民是初婚人士，未婚的比例为21.66%，较去年有小幅提升。其他婚姻状况的比重都相对较小，离异比重为1.3%。分地区来看，珠三角地区的初婚率最高，为73.54%。未婚状况中西翼的比例最高，为23.99%，同时，西翼的初婚率也最低，为67.70%。而从离婚情况来看，山区处于离

婚状态人群比例则高于其他地区，占比为2.21%。

近年来，未婚青年数量的持续增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高价彩礼等不良婚俗现象，也对倡导适度婚俗礼仪、推广良好婚姻理念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关注广东省农村青年的婚嫁彩礼基本情况，2020年的村庄问卷对农村的婚嫁彩礼情况展开了专门调查。

表2 嫁妆一般由哪方出资（单位：%）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全部女方	32.34	20.39	35.71	23.10	44.14
全部男方	16.92	7.63	8.18	22.31	26.55
女方出大部分	10.96	7.66	19.59	15.62	4.69
男方出大部分	22.24	33.05	16.04	27.89	15.31
不一定看情况	17.55	31.26	20.49	11.08	9.30

2019年，全省30岁以上单身男性的比例为4.83%，30岁以上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比例为3.34%。分地区来看，西翼地区30岁以上单身男性的比例为7.01%，30岁以上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比例为4.66%，未婚青年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从各地区彩礼嫁妆的价格来看，东翼地区彩礼价格为各地区最高，平均为 3.22 万元，山区嫁妆价格为各地区最高，平均为 2.81 万元。而根据 2020 年腾讯新闻谷雨数据发布的《2020 年国人彩礼调查》显示，全国平均值为 6.9 万元，因此总体来看，广东地区的彩礼和嫁妆价格水平并不算高。

这可能和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风俗有一定关系，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更好的地区，彩礼水平可能更低，例如珠三角地区的彩礼水平就比较低，粤东西北反而更高一些。另外，根据我们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广东本身在全国彩礼水平低，这可能与广东本身在全国经济水平较高有关。一种说法，彩礼是对女方丧失劳动力的经济补偿，那么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广东，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社会保障较为充足，便不需要彩礼作为家庭的经济补偿，代际剥削随之可能更小。

关于本村嫁妆一般由哪方出资，2020 年广东千村调查数据显示，32.34% 的受访村干部表明全部由女方提供，16.92% 的村干部表明全部由男方提供，10.96% 的村干部表示女方出大部分，22.24% 的村干部表示男方出大部分。

在此问题上，各地区之间表现出较大差异性，珠三角和西翼地区选择男方出大部分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 33.05% 和 27.89%，东翼地区和山区选择全部由女方出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35.71% 和 44.14%。地区之间嫁妆来源的差异不仅与当地风俗习惯有关，也可能来源于地区经济差异。

千村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农户在家 0 月的比例显著高于往年比例，而半年内在家 1-5 个月的比例有所下降，半年内均在家的比例则与往年基本持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冠疫情对农村生产生活的影响，疫情的发生，可能增加了农村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驱使更多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为家庭多谋得一份收入。

此外，调研组还统计了两年来居民过去半年中一直不在本户居住的主要原因，从总体情况看，两年来过去半

年未在本户居住的原因分布大体一致，“在外就业”是各地区居民一直不在家居住的主要原因。从趋势来看，在外就业因素的比例有所升高，上学因素的比例则有所降低。2020 年，全省农村居民未在本户居住的居民中，71.27% 的居民原因为“在外就业”，13.47% 的居民原因为“上学”，而在 2019 年的千村调查中，选择“在外就业”的比例则为 66.43%，选择“上学”的比例为 18.88%。另外还有小部分比例的居民原因为“家属随迁”、“看护病人，照顾老人孩子”等。

在外就业和上学因素占比的趋势变化，呈现了全省非户籍人口的一种就业和就学趋势，综合两年情况来看，在外就业比例的提高，依旧反映了城乡或地区之间的工作机会不平等，而外出上学的比例降低可能反映了户籍地教育水平以及外出地教育政策的一些变化。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新闻网

公办幼儿园数量不达标，高中在校率待提升

作者：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钱文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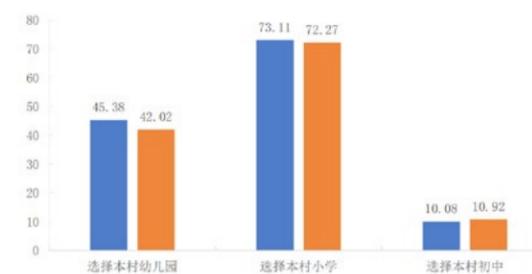
农村学校建设和儿童就近入学情况

2020 年千村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广东农村，近九成的村是有小学的，有一半的村有幼儿园，初中则比较少，基本符合在农村建设乡村小学和初中的建设原则。

在农村学校建设方面，51.26% 的行政村内有幼儿园，86.55% 的行政村内建立了小学；从数量来看，全省每个行政村平均会有一所小学，幼儿园数量也接近一所，这表明部分行政村有两所或以上的小学 and 幼儿园，乡村小学学校的建设已经比较完善。

在这三个教育阶段中，有初中的行政村占比最低，为 12.61%，而且几乎所有有初中的行政村都只有一所初中。

《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调查数据显示，近八成广东农村户籍儿童对口小学在本村并在本村入学。广东省户籍儿童对口本村小学的农村比例达到 77.31%，对口本村初中比例有 12.61%。对口本村学校的前提是村内有相应阶段的学校，因此对口本村小学和初中的比例的差距也对应了两类学校在农村建设情况的差距。从户籍儿童就读本村学校比例看，小学阶段的就近入学情况良好。其中儿童选择就读本村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比例分别为 42.02%、72.27%、10.92%，这些比例较有相应教育机构的村的占比低 2%-14%，这也符合在本村就读的前提是村内有相应阶段的学校的事实。



2019和2020年儿童就读本村内各阶段学校的比例(%)

调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的公办比例很高，且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非常高，但幼儿入读公办园的比例不足 40%。

在三个教育阶段中，小学和初中的公办百分比都接近 100%，有 94.91% 的儿童就读公办小学，93.62% 的儿童就读公办初中；幼儿园公办占比为 46.59%，同时有 36.52% 的儿童选择就读公办幼儿园。

办好学前教育，加快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建设，保证学龄前儿童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是教育阶段中最重要且最具有奠基意义的一步，为后面的义务教育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要求，各地区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每个乡镇至少办好 1 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完善乡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

2020 年广东千村调查发现，超过七成的农村的乡镇范围内建有公办中心幼儿园。广东省有 76.27% 农村的乡镇范围内有公办中心幼儿园。分区域来看，西翼和山区的农村有公办中心幼儿园的村占比较高，都在 90% 以上，珠三角地区的比例和全省相近，在 76% 左右，东翼地区的占比最低，仅有 46.88%，远低于全省水平。因此，政府在继续增加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的建设时，需要更多关注东翼地区公办中心幼儿园的建设情况，保证全省各区域学龄前儿童能享受到同样的教育机构和待遇。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乡村仍存在“麻雀学校”，例如有 3.13% 的农村小学规模在 10 人以下。对于这些生源极少的小规模学校，需要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推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装备配备，加强经费投入使用管理，切实保障其正常运行。

农村学校建设和儿童就近入学情况

根据2020年千村调查，广东4-6岁幼儿的在园率为84.16%。

调查显示，2020年7-12岁的儿童在校率都稳定在接近100%的高水平，但13-15岁的在校率为96%，仍需努力。2020年广东农村地区小学年龄阶段的儿童在校率比2015年全国农村的高，而初中年龄阶段的儿童在校率几乎一致。

高中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是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关键发展期，对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调查显示，2020年广东农村16-18岁的儿童在校率为82.29%，相比于2015年全国农村高中年龄阶段儿童情况，2020年广东农村高中年龄阶段儿童的在校率仅提升0.79%，仍有待继续提升。

农村各年龄阶段儿童在校率（单位：%）

年龄	2020 广东	2019 广东	2015 全国
7-12岁	99.39	99.44	94.70
13-15岁	96.00	96.64	96.30
16-18岁	82.29		8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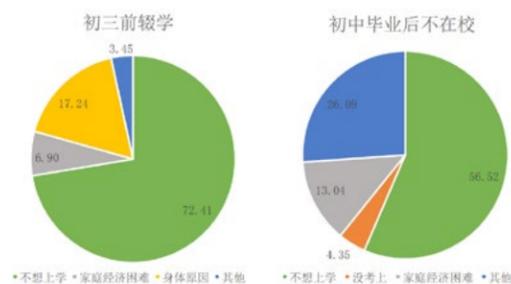
注：2020和2019年数据来自广东省千村调查，年龄阶段参照左列；2015年全国农村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年龄阶段为标准入学年龄（6-11岁，12-14岁，15-17岁）。

在教育费用方面，中职的学费是最高的，平均每年5490元，其次是幼儿园的2645元，普高的学费较为便宜，平均为1194元，小学和初中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免学费政策，仅有民办学校有学费，所以平均学费是最少的，为105元和205元。除学费外的其它教育花费中，中职和普高的食宿费用是最高的，平均在2500元左右，而小学初中的食宿费用都较低，可能因为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食宿补贴较大，如爱心午餐等。另外，中职和普高的课外班费用是最低的，均不足100元。从总的教育费用来看，中职为8985元，是最高的，其次普高的教育费用也很高（4488元），小学和初中的总教育费用都很低，平均为1166元和1869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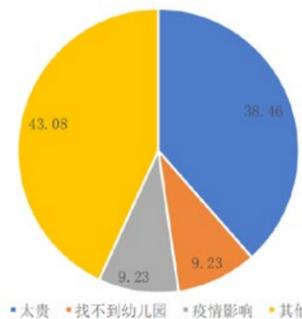
千村调查显示，广东农村地区儿童的身高体重发育情况相比于城市儿童更差，需要重视。比较农村和全省的数据可以看出，不论男孩和女孩，农村幼儿的身高和体重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数据，这说明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儿童得不到较好的营养补充。

千村调查询问了不在校儿童目前的工作状况，对16岁以下的不在校儿童，有94.12%的人“什么都没干”，其余的5.88%在从事非农自我经营；对于16岁以上的不在校儿童，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从事工资性就业，“什么都没干”的比例也有38.24%，还有5.88%的儿童选择了务农。这说明广东农村在控辍保学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针对16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宣传和建设，也可以通过进校入户、明察暗访等形式，对不在校儿童进行劝返，让他们重新学习。

根据千村调查的结果，2020年广东农村的留守儿童占比为46.79%。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学生占比随教育阶段的递进从52.06%逐步降低到31.18%，分区域来看，山区各教育阶段的留守学生占比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幼儿园和小学的留守学生比例在69%左右，初中更是高达71.11%，中职和普高则分别为66.67%和64.71%。



农村儿童不在校原因（%）



幼儿不在园原因（%）注：其他（例如上学前班、交通不便、身体和家庭原因等）

在个人和家庭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女性比例更大，占比（46.35%）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49.76%），留守儿童父亲高中及以上学历百分比（19.55%）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24.65%），留守儿童家里孩子数量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从个人表现来看，留守儿童的身体发育不及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BMI指数（Body Mass Index，体质指数）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从亲子交流情况来看，因为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不在家，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各项亲子交流活动很明显没有非留守儿童频繁。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政府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其中村庄巡访就是一个重要手段。我们询问了村庄留守儿童定期巡访制度的建立情况，从全省情况来看，整体建立比例并不高，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巡访同样需要进一步加强。调查显示，有24.14%的村庄表示建立并定期巡访，有6.03%的村庄表示未建立但定期巡访，有12.07%的村庄表示已建立但未定期巡访，57.76%的村庄表示未建立也未定期巡访。分地区来看，山区建立并定期巡访留守儿童的比例依然最高，占比为35.71%，珠三角地区未建立也未定期巡访的比例最高，达到66.67%。

政策建议

根据2020年千村调查的结果分析，我们对广东省的乡村教育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好农村各阶段教育机构的建设。对于各区域教学设施建设的不平衡，广东政府应该更多关注西翼地区的情况，增加该地区初中建设，争取减少儿童上下学距离和时长，更贴近义务教育就近上学原则。

对于各阶段教育机构的整体建设情况，第一，依据中央政府的要求[注：2018年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广东省的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数量没有达到指标，幼儿园的整体建设也不足，导致幼儿上学距离太远。

因此依旧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达到每个乡镇至少办好1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完善乡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

第二，对于农村部分小规模学校，需要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装备配备，加强经费投入使用管理，切实保障其正常运行。

二、要关爱农村幼儿生长发育和正常就学情况。幼儿时期的发育情况会影响到以后的生长发育，根据调查结果，广东农村地区幼儿的身高体重发育水平相较城市儿童的情况更差。生长发育和最直接的营养补充相关，所以政府应该关注农村幼儿的饮食营养，可以从家庭和幼儿园两方面入手：给有幼儿的家庭和幼儿园提供营养餐补，提高他们的饮食水平；其次，广东农村在提高幼儿入园和高年龄阶段儿童在校率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广东省农村学龄前不在园儿童的比例为15.84%，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幼儿园建设不足，另外还有很大部分家长反映是因为幼儿园学费太贵，因此政府还需要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支出，实现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并通过政策大力鼓励普惠幼儿园的建设。

另外，广东农村高中年龄阶段的儿童在校率不够高，中职学校的学费昂贵，政府需要继续推进“普及高中教育”，让中职教育、普高的建设运营更为普惠性，降低农村学生高中阶段就读的经济压力与负担；同时还可以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宣传和建设，以及通过进校入户、明察暗访等形式，对不在校儿童进行劝返，让他们重新学习。

三、要关注农村儿童中的特殊群体——寄宿儿童和留守儿童，并针对他们不同的需求给予一定的关心与爱护，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

对于寄宿儿童，学校应该作为主力多关注和帮助他们。初中大部分寄宿学生都是因为留守而寄宿，所以除了改善伙食增加营养，老师应该更频繁地与他们进行生活上的沟通，及时解决学习和生活问题；对于高中的寄

表7 村民对以下说法的知情情况 (单位: %)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24.4	29.6	19.4	24.3	25.1
清产核资	12.8	18.8	9.63	11.1	12.5
土地确权	70.5	71.5	59.7	73.7	78.2
集体经济组织	22.5	29.7	14.3	19.4	28.1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	15.2	25.7	8.39	13.4	14.4
认	0	0	0	0	2
股份量化及股权设置	11.9	25.8	6.11	8.25	8.72
	3	8			

2、身份确认倍受关注,收益分配存在争议。在集体产权改革工作的推进过程中,约有五分之一的村民对其村所制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标准存有异议,约有十分之一对其村的身份界定方法表示不满意。在集体产权收益分配上,近四成的村民对集体分红表示不满意。全省有分红的村的比例不到20%,并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虽然珠三角地区农民获得的分红相对较多,珠三角村民对本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分红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将近一半的受访村民明确表示不满意。以上数据表明,成员认定制度标准与集体资产收益分配待完善。

表8 村民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标准是否有异议 (单位: %)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有	18.95	20.67	15.15	17.86	17.39
没有	71.23	70.00	72.73	69.64	76.09
不知道	9.82	9.33	12.12	12.50	6.52

3、成员资格标准有待完善,静态管理存在短板。目前广东农村集体产权股份的股红分配主要依据的是“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的股权静态管理模式。然而现实情况千差万别,以上原则不能完全指引现实操作。继承、转让、赠与等的流转原则和办理程序,却一直未有明确的指引。这一缺失导致了股权无序流转时有发生。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和迁移,严格静态的股权固化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缺陷和短板。例如,东莞塘厦镇林村社区已故480名股东中,约10%暂时无法办理股权继承,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股东在配股后迁往港澳台等境外地方,股东去世后,继承人难以联系或暂时无法返回大陆;二是股东有多个子女继承,但家族内部无法统一意见决定由谁行使股权权利。股权继承相应搁置。以上股份暂时由股份经济合作社代管理。

4、资产监管配套不足,信息化程度有限。在当前清产核资过程中,仍有约20%的村庄没有配备专门的负责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人员,尤其在山区,仅有62.5%的村在清产核资过程中配备了专门的会计核算人员。其次,村民对所在村的集体资产财务公开工作的态度分化较大,全省约有26.6%的村民表示不满意,32.5%的村民评价一般。在规范性方面,只有约40%的村民认为本村在集体资产财务管理规范。在西翼和东翼地区,超过30%的村民认为本村的财务管理不规范。最后,全省采用APP(手机应用)对村级财务进行管理和监督或者发布村务信息、处理村级合同业务的村的比例仅有49%,并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东翼、西翼和山区地区相对落后。

表9 采用APP对村级财务进行管理和监督 (单位: %)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有	48.74	66.67	46.88	34.38	50.00
没有	48.74	29.63	53.13	62.50	46.43
不知道	2.52	3.70	0	3.13	3.57

三、关于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建议

(一) 优化改革资源配置向粤东西北部地区倾斜。目前广东产权改革工作整体推进良好,但在工作推进、制度建设等方面上,粤西、山区及粤东地区进展相对落后。建议根据产权改革工作不同方面进展情况,优化对应的改革资源配置向粤东西北部地区倾斜。具体而言,一是推进粤东地区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作为有力抓手,优先在以上地区选配强党组织书记;在乡镇配足专项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清产核资的工作人员,为集体产权改革工作提供充分的人才保障;二是提供专项改革资金支持,加快推进以上地区集体产权改革工作;三是加大力度提升以上地区的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水平,通过财务人员培训计划、信息化数字化改造等方式,提供对应的支持。

(二) 加大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探索力度。首先是完善产权改革过程中的认定标准与分配方法。目前在成员认定、股份量化、股权设置、股权类型及颁发股权证等问题上,不同村庄的举措不一,缺乏统一性。对于这一关乎村民切身利益的制度设计与推行,要完善现有的产

权改革治理结构,使村民的意见与异议有途径可以申述、有举措可以处理,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次,针对静态股权固化模式存在后续调整困难,建议逐步完善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探索不同形式的权能模式。积极探索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包括内部转让和集体赎回)制度,加大探索研究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等权能和新增人口股份权能的实现形式,使其更加充分地发挥股份制的优势,体现集体资产股份的价值。

(三) 做好集体产权改革工作的普及宣传工作。村民接受信息的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路径,受众群体小,影响力弱。村民对集体产权

改革工作的不了解与不清楚,将影响村民对集体产权改革监督与管理工作的参与。建议推进集体产权改革的宣传工作,结合新媒体技术、互联网+平台,通过公众号、短视频等形式,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

(四) 利用好信息化技术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针对技术集体资产财务保障性不够、规范性不足、满意度较低,建议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集体资产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推进利用手机应用进行政务公开的信息化建设工作,使村民可以及时了解财务公开情况,提升财务监督管理的规范性与保障性。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

【界面新闻】蔡澍：“小额信贷”为何以及如何在中国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蔡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

2006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财政部发起一项乡村小额信贷项目——“贫困村互助资金”项

目,解决了农户生产活动资金匮乏的问题。为什么互助资金的实践单单在中国获得了成功?

2020年,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是下一阶段的目标。

在扶贫和乡村振兴中,合理运用金融工具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将回顾金融工具、尤其是普惠金融在扶贫工作中的角色。金融工具在扶贫工作中是否发挥作用、又如何发挥作用?事实上,金融扶贫在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2005-2007年,国家推动正规金融服务下乡,结果却收效甚微。最终,中国找到“小额信贷”这把扶贫利剑。通过总结金融扶贫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让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加积极的角色。

01 贫困陷阱存在吗？

如果一个人落入“陷阱”，那么除非有人搭把手，否则落入陷阱的人无法轻易逃离。“贫困陷阱”即描绘了人们长期陷于贫困、除非外力帮助难以脱贫致富的状态。俗话说“穷则思变”，但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他们缺乏“变”的资本，最终只能囿于现状。更广义地讲，“贫困陷阱”也可以指一个国家长期陷于经济落后的局面，或几代人长期维持贫困状态而无法挣脱。

为什么“贫困陷阱”会形成？经济学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类观点认为，人为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是主因。如，恶劣的自然条件可能导致一个地区早期经济发展较差；因为早期发展差，贫困户缺乏足够的资金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他们往往难以靠经营农牧业脱贫；同样，落后地区由于缺乏公共资金，公路、水电等公共设施难以发展，这既限制了外部投资，也限制了当地居民外出务工。从时间维度上看，家庭贫困也可能导致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导致劳动力素质较低。种种因素加总，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该地区的人们难以跳出贫困陷阱。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人的有限理性是致贫的重要因素。俗话说“人穷志短”，穷人往往厌恶风险、缺乏长远目光，行为决策也难以达到长期最优。笔者曾经从实地调研中了解到，有些贫困户宁愿维持当前的贫困状态，也不敢尝试新事物，缺乏脱贫干劲。此外，贫困往往不利于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比如，贫困地区很多人嗜酒、嗜赌；在贫困环境下养成或强化的不良性格和习惯，进一步制约贫困户走出贫困陷阱的可能。

现实往往比理论归纳更加错综复杂，上述两方面的机制可能同时存在，这也增加了扶贫的难度。从中国的实际看，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背景下，仍有数量相当的乡村人口无法脱离贫困。这从侧面说明，贫困陷阱在这些地区是存在的。因此，外部力量为落后地区“搭把手”，显得十分必要。

面对盘根错节的致贫原因，乡村普惠金融服务着力于向贫困户提供发展生产的启动资金，助推贫困户跳出“贫困陷阱”。为什么只有普惠金融成功了？乡村原先的私人借贷和正规金融服务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这要从中国乡村的背景谈起。

02 农村金融的困境

1997年11月，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聚焦化解系统性金融隐患、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等问题。随后，各类金融机构开始对经营不善的分支机构进行撤并，正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的营业网点大规模从落后农村地区撤出，农村的正规金融服务出现空白。

在正规金融服务长期缺位的情况下，乡村居民对资金的需求主要通过亲友获得。然而，“救急不救穷”是这类借贷行为的典型特征。具体而言，熟人借贷往往主要用于消费，如生病、为孩子交学费等等，用于生产活动的则较少。

为什么会“救急不救穷”？在经济学家看来，除了道德原因，这种现象也存在一定的经济逻辑。乡村居民由于血缘等关系互相联系，构筑了一张风险分担的网络。对于个体风险，如生病、婚丧嫁娶导致的资金需求，不同家户往往在不同时间经历。今天王家着急用钱治病，李家会借给他们；来日李家急着为女儿办嫁妆，王家也会借给他们。在互帮互助的预期下，不同家户分担彼此的风险，一起渡过难关。然而，相比于这类“消费支出”，生产活动支出的风险则可能是系统性的。比如，一户家庭想借钱种植经济作物，但是潜在的借出者会预期，当天灾到来，整个村庄都会受到影响，我无法指望其他家户能够帮助自己；因此，潜在借出者会倾向于自己存钱而不借出。

既然非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家户生产活动的资金需要，当正规金融机构重返乡村，这一需求能得到满足吗？答案并不乐观。笔者的一项合作研究利用2007年中国政府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动正规金融机构重返乡村这一外生冲击，检验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对家户金融活动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农村金融营业网点增加，家户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增加了；这主要由于银行风险更低、存款更有保障。然而，金融营业网点的到来并没有增加家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数额。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我们发现仅有不足5%的乡村家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大部分乡村家庭而言，他们缺乏足够的抵押品或信用记录；因此，正规金融机构常常无法估计他们违约的可能性。结果，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高企，正规金融机构不愿贷款给这些家户。

总而言之，无论是根植于乡村社会网络的非正规借贷，还是在乡村地区开设的正规金融机构，都没有解决农户生产活动资金匮乏的问题——人们仍被困在“贫困陷阱”之中。

03 小额信贷，扶贫之利剑

2006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财政部发起一项乡村小额信贷项目——“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具体而言，每个村庄能够从政府获得15万启动资金，并建立由村民自我管理和运行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负责互助资金的收支管理。笔者与Albert Park、汪三贵的合作论文发现，互助资金的引入显著提高了家户的自雇收入和务工收入。对比世界同类的小额信贷项目，中国项目的成效可谓一枝独秀。为什么互助资金的实践单单在中国获得了成功？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组织和放贷方式。

由前文讨论可知，由于贫困户缺乏足够的抵押品或信用记录，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批准他们的贷款申请。相比之下，互助社贷款无需抵押物，主要要求借贷者作小组担保。一般由5至7人组成一个互相担保的小组，成员对组内其他人员的负责负有责任；如果组内有人拖欠贷款，那么同组其他人均无法获得新的贷款。依赖于熟人社会的互相监督，互助资金的清偿率达到98%。

第二，是互助资金贷款的利率和还款频率。

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是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具有明显的普惠性质。相比农村信用合作社同类贷款10.8%的平均年利率，互助社贷款的平均年利率仅为9.4%，显著低于市场价格。

此外，相比外国小额信贷项目要求贷款每周或隔月偿还，中国项目仅要求在到期后一次性清偿。较低的还贷频率降低了贷款者的短期还款压力，使他们能够进行回报更高的长期投资，如种植经济作物、到外省务工等。

第三，是中国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

项目开始前，中国乡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服务发展滞后，居民对资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互助资金的引入使家户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大种植面积、尤其是经济

作物的播种面积。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市场往往能为外出务工者提供较高的工资，但工作地点往往离外出务工者的居住地非常远，外出务工的成本较高；小额信贷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提供资金，促进了他们外出务工，最终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收入。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互助资金项目成功满足了农村家庭生产活动的资金需求，有力助推家户跳出贫困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互助资金可能对原先的人际网络产生冲击。笔者注意到，虽然互助资金原则上并不向家户提供消费借贷，但在互助资金项目落地后，家户向亲友的非正规消费借贷显著减少了。深入考察发现，该现象的成因是互助资金降低了家户预防性存款的紧迫性。对此不妨举例说明：对农村家庭来说，年关将至，至少面临两个花钱项目：一是置办年货，二是购买开春的种子或秧苗。根据“救急不救穷”的原则，一个家庭容易借到置办年货的钱，较难借到开春购买种子的钱。没有互助资金时，贫困户倾向于向亲朋好友借钱购置年货，把家里储蓄留到开春购买种子或秧苗。有了互助资金后，贫困户预期明年开春可以从互助社获得贷款，因此他们可以动用家庭储蓄购买年货，无须向亲友借钱。

社会网络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村民之间非正规借贷的联系减弱，村民互相依赖的程度也随之降低。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村民互帮互助的预期、互相监督的力度，最终改变项目赖以成功的非正式人际关系。

04 小结

本文回顾了发展经济学对长期贫困的理论分析，中国乡村金融服务的背景和困境，以及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成功的原因。中国金融扶贫实践的经验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普惠金融的实施要注意利用村庄熟人社会的特点，以解决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其次，分析普惠金融项目成效时，要注意到外部政策对全局均衡的动态影响；原先令互助资金项目成功的因素（如村庄的社会网络），可能随着项目实施而发生改变，进而对政策效果产生全局性影响。

本文首发在界面新闻

国际种业格局变迁的两大内在动力

作者：崔潇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写在前面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种业发展提到了粮食安全战略的高度。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表示要将种子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打好种业翻身仗”。放眼全球，种业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由公共部门主导向私营部门主导的转向，并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商业化种子市场。全球商业化种子市场的总体规模预计会在不久的将来突破千亿美元。种业具有高研发投入的特点，其研发投入所占收入份额也远高于其它农业投入品行业。在过去几年间，全球种业的产业格局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迁。陶氏（Dow）与杜邦（DuPont）合并，并在随后拆分出了名为科迪华（Corteva）的农业企业。此后，拜耳（Bayer）并购孟山都（Monsanto），种业中的主要角力者从6个变成了4个。而排名第四的巴斯夫（BASF）又收购了从拜耳剥离出的部分业务。与此同时，中化收购了行业巨头先正达（Syngenta）。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际种业格局变迁的两大内在动力。部分内容编译、整理自经合组织经济学家 Koen Deconinck 博士的学术论文及经合组织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

01 实现产品互补性

只有有价值的遗传特性植入有价值的品种中才能真正满足农户的需求。这一植入过程也往往意味着性状和品种间互补性的建立。对单一企业而言，将这些过程内

化有助于促进研发和营销，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性状、品种与植保化学品之间的相互联系。以转基因种子为例，其与植保化学品之间既可能是互补关系，也可能是替代关系；前者体现在耐除草剂性状与除草剂之间，后者则体现在抗虫性状和杀虫剂之间。选择不同侧重点会影响公司的战略。企业合并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不仅可以通过投资互补产品使得正外部效应内部化，还有利于协调研发过程。

1990-2010年间种子和生物技术企业的合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互补性。在上世纪90年代的种子和生物技术市场中，公司一般会通过内部研发或收购来获取工具、性状和品种专利的多样化组合。这类具备互补性的知识资产显然大幅推进了市场结构变化。孟山都最初从事化学品生产，以除草剂产品“农达（Roundup）”打开了农业市场。孟山都很早就意识到了基因工程的潜力，随即收购了一系列种子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并将其发展成核心业务。现如今活跃于该行业的许多公司也曾将植保化学品、种子和基因业务相结合。先正达的前身是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化学）、Vanderhave（种子）和 MoGen（基因）。科迪华的血统则包括杜邦（化学）、Pioneer Hi-Bred（种子）、陶氏（化学）、AgriGenetics（种子和基因）、Pannar（种子）和 Verdia（基因）。一个关于互补性的新维度潜藏于数字农业之中。大数据使得企业有更多途径获取有关种子、性状和农业化学品最佳组合的信息，从而能给农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数字农业可能会激发研发和市场营销之间的互补性，产生与转基因技术类似的变革性影响。拜耳并购孟山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看中了孟山都早期在数字农业领域的领先优势。目前，行业中的其它主要参与者也都开发了与数字农业和精准农业相关的产品。这种互补性与知识产权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知识产权对种子和生物技术市场至关重要，但其在刺激行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尚不明晰。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公司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革新，此时收购与合并将成为化解障碍的重要方式。但在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刺激企业对知识产权进行授权许可。比如，美国的大型公司广泛推进知识产权的交叉授权许可，进而得以提供堆叠了多家公司所开发转基因性状的产品。

02 追求规模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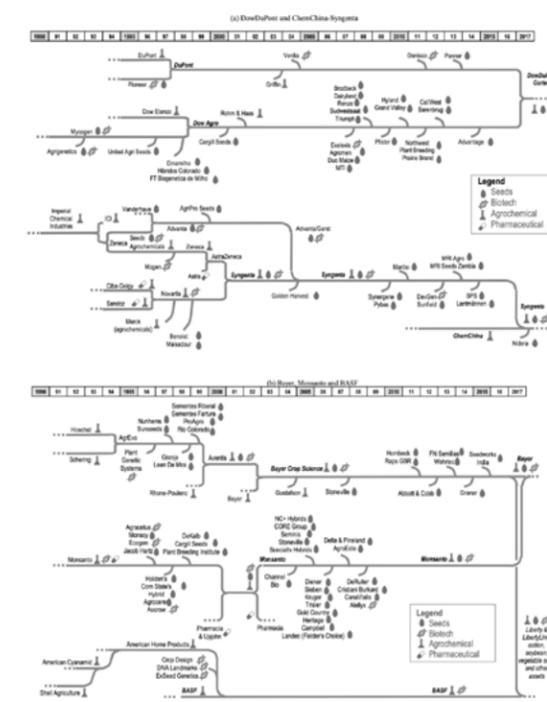
除了进行互补组合外，种业在行业格局变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对同质化的企业合并，较具代表性的案例包括2014年先正达对Adventa/Garst的收购。这种横向合并的驱动力主要源自监管和研发这两大块固定成本。

引进转基因作物的审批成本相当可观。审批流程在美国需要2500天，在欧盟需要1800天。据估计，转基因玉米的合规性财务成本在600万-1500万美元之间；而行业资助的研究则表明，该成本高达3500万美元，占总成本的26%。即使没有明确的监管要求，公司也会进行安全测试以规避潜在风险。因此，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对监管成本精确的估计值，但高昂监管成本的存在毋庸置疑。高固定成本导致了转基因难以应用在市场小的作物上，同时还导致转基因产品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只要监管费用这一固定成本的增长速度慢于市场规模的扩张，不断扩大的转基因种子市场就应该能容纳越来越多的公司。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成本因素是研发成本。在这样一个严重依赖创新的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就是研发的竞争。市场体量的增加会刺激研发投入，从而间接提高了固定成本和市场进入壁垒。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在美国转基因玉米种子市场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合并是企业应对研发支出负担的一种理性方式。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资产互补共同推动了近年来的企业并购。中化收购先正达之前，只活跃于非专利农药领域，在种子和生物技术领域并不突出。通过收购先正达，中国化工扩大了它在农用化学品领域的产品组合，还获得了种子和生物技术方面的补充资产。再以陶氏和杜邦为例，合并之前两家公司专长不同，陶氏侧重于农作物保护化学制品，杜邦更侧重于种子和转基因特性。与此类似，拜耳的农作物科研部门主要靠作物保护化学制品营收，孟山都的主要收入来源则是种子和生物技术。

03 结语

作为促进行业格局变迁的两大内在动力，产品互补性和规模经济之间未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就当前的行业巨头而言，其相对广泛的业务领域意味着相对多样化的战略投资选择。产品互补性和规模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具体业务部门的并购、分拆事件中。就行业总体而言，行业的集中度在不断提升。市场也因此存在着产品价格上升和创新能力下降两方面的担忧。由于种业的相对封闭性，目前缺乏足够的公开数据来支撑对价格、创新两方面影响的严谨分析。种业结构变迁对市场的长期影响仍是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文章附图：



注：上图体现了1990年以来国际种业产业格局主要变化，图(a)主要反映了围绕陶氏、杜邦和先正达的分拆、合并；图(b)聚焦于拜耳、孟山都和巴斯夫。资料来源于经合组织于2018年发布的报告“Concentration in Seed Markets: Potential Effects and Policy Responses”。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财政保障机制

作者：李承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李怡静（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研究生）



农村人居环境长期以来“脏乱差”问题突出，是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过程中的短板。201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见》明确指出，力争到2020年全省基本完成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任务。2017年开始，广东省以“三清三拆三整治”为切入点，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对此，广东省级财政也大力支持，补助欠发达地区完成相关工作。2020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继续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了专题调查。最新的一手调查数据发现，广东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比较大的成效，农村人居环境获得明显改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财政支持和保障方面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本文从财政保障机制的视角，借鉴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地区在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成功经验，尝试对广东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财政支持政策的成效和不足

2020年广东千村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投入大，相关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农村

人居环境获得明显改善。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省基本做到村村有垃圾收集点，垃圾运输与处理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99%）。2020年，广东农村加快生活污水排放管道建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大幅提高（普及率为74%，相比2019年提升23%）。“厕所革命”成效明显，村庄公共卫生厕所普及率提升明显（普及率为82%，相比2019年提升12%）。自2017年以来，广东省以“三清三拆三整治”为切入点，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省级和地方财政对此给予大力支持。调查显示，已有89.92%的行政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了获得了上级财政部门的专项拨款，全省平均值为103.61万元。

与此同时，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财政支持政策也存在一些不足。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投入的现状是以省财政投入为主，地方部门投入为辅，部分地区整治工作无法保持可持续性，缺乏长效管护机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实际运行中处理效果要远低于预期，在一些村落污水处理系统处于闲置状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建设已经比较完善，但是后续的管理费用过高，许多地区难以负担，一旦离开政府的财政补贴就会出现较大的资金缺口。此外，全省大部分的农村居民尚未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在进行村容村貌整治和建筑规划工作中，许多地区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虽然政府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相比实际整治工作需要的资金还存在很大差距。而且，各个村庄获得的专项资金的金额差距很大，最多的可达1000万元，最少的只有1万元。许多地方因资金不足或缺乏后续资金，无法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保障机制，导致村民的配合度不高。

国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经验总结

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较早，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尝试与调整，目前均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以美国、日本和欧盟地区为典型，归纳与总结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先进经验（见表1）。

表1 国外典型国家（地区）先进经验总结

国家或地区	立法（条例）	资金筹措	激励机制（奖惩办法）	具体成效
美国	《清洁水法》 《固体废物处理法》 《资源保护及再利用法》 《污染防治法》等	联邦拨款计划；水污染控制周转基金；相关部门和州政府的资金拨款；农业部提供引导性资助	提供减税、补助降低污水处理支出；私自处理垃圾违法行为，将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分散型污水处理体系；分散型垃圾处理体系
日本	《净化槽法》 《废弃物处理法》 《容器及包装物回收利用法》 《家电回收利用法》等	国家给予部分财政支持，剩余由各自治体自行筹措，居民支付垃圾处理费和污水处理费等	补贴安装和更换净化槽的居民；补贴从事绿色农业的农户；乱扔垃圾可能被判罚与罚款	以净化槽技术为依托的分散型污水处理系统；农村垃圾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欧盟	《2007—2013年农村发展条例》 《委员会第92/316/EEC号指令》 《委员会第92/316/EEC号指令》 《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框架指令》等	欧洲农业担保基金；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成员国共同出资；个人或机构的捐助	停止为不满足环保要求的农民提供补贴；对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民加大补贴力度；补贴自愿签订长期农业环境协议的农民	农村环境改善；农村生活质量提高；发展了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环境受到严格检测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例，形成科学的制约机制，并在实施过程中对其进行修改与完善，使其更适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如美国的《清洁水法》，日本的《净化槽法》、《废弃物处理法》，欧盟《2007—2013年农村发展条例》中都明确了保护农村环境、提高农村地区生活质量的目标。

其次，多渠道筹措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资金，形成保障机制。虽然具体形式上存在些许差异，但是美国、日本的建设资金都是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居民三方共同承担，欧盟地区的建设资金是由欧盟筹措以及各成员国共同出资，并由欧盟统一管理。

最后，建立有效的激励和奖惩机制。美国和日本都通过补贴的方式引导居民更多的安装分散型污水处理系统，欧盟地区则在农业环保上给予农民补贴，并且在美国私自处理垃圾以及在日本乱扔垃圾都属于违法行为，都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得益于完善的法律体系，多渠道且稳定的资金来源，有效的激励机制，美国、日本和欧盟地区乡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成效显著，不仅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和健康意识也普遍增强。

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财政保障机制的政策建议

01 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一是要落实财政投入。设定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合理安排和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恰当使用，同时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资金运用到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达到预期目标。二是整合项目资源。整合各类与农业相关的专项资金，统筹使用、集中力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尤其在整治工作的开始阶段，应当适度将资金向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基础较好，村民整治意愿较高的村庄倾斜，率先建成一些示范村，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

02 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引导机制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支持、村民参与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投入机制，优化政府资金的投入方式、方向、结构，充分发挥政府在整治工作中的引领作用。一是政府主导。继续发挥政府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导作用。基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这一现实，可以由省政府出资为各地设立周转基金，其中，省级财政承担一部分资金，其余部分由地方政府提供匹配资金，以实现资金供给的持续性。二是引入社会资本。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承包、采购等方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出台涉及资源开发、污染治理、生态农业建设等优惠政策，加大奖补力度；完善民间组织开展捐资捐物、义务劳动等农村文明建设活动的资金支持政策。最后，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关键的是要让当地的村民通过出资出劳的方式共同参与到整治和监督工作中来，要激发村民进行村庄的人居环境改善的动力和热情，提升其环境保护意识，只有这样，投入的资金才能真正用在“刀刃”上。

03 建立相应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成效为主要内容，对建设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与考核，考核的结果将作为公共资金和社会资本再次投入的依据。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做法，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中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评估，在评估的过程中应更加关注听取广大农村居民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定期组织开展建设效能评估工作，达到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投入各方优势互补的目的。二是完善农户付费机制。逐步向农村居民收取一定费用，付费机制的建立要注意时机与方式的选择。逐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市场意识，向农村居民普及“谁收益，谁付费”的观念，让

农民了解为环保付费是大势所趋，这也是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改善农村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

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谢慧如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

家庭经济专题

唐高洁：中国的离婚率高？你可能被骗了

作者：唐高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随着婚姻稳定性肉眼可见地下降，与离婚相关的法案备受关注。《民法典》对婚姻法条的修改，尤其是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在争论我们需要怎样的离婚政策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些基本事实。

粗离婚率在骗你，中国的婚姻其实超级稳定

打开任何一个搜索引擎，搜索中国离婚率，都能看到各种网站在为中国年年高企的离婚率忧心忡忡，甚至有文章表示，中国离婚率超40%，这其中不少文章其实是在教授网友在婚姻脆弱的现代社会该如何维持爱情。但

是，数据显示即使是被认为思想浪漫、崇尚自由恋爱的80后，婚姻仍然非常稳定，离婚率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事实上，我们常在媒体中看到的动辄超过30%的“离婚率”是错误的，由当年离婚人数除以当年结婚人数计算而来。很明显，结婚和离婚是两个不同人群的选择，这一计算方法得到的“离结比”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目前，对于一国或一地区的婚姻稳定性衡量的主要指标为粗离婚率，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婚姻稳定度的指标。粗离婚率一般表示为当年离婚对数除以总人口的比例，但总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群并不具有离婚风险，包括未成年人和未婚的成年人。以总人口为分母的粗离婚率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离婚对数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婚姻的普遍性。因此，粗离婚率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婚姻稳定程度，但并不准确。在人口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以及在与其他人人口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进行国际对比时，粗离婚率可比性较差，并可能带来错误的理解。

对婚姻稳定度更细致、更准确的衡量，应该是看婚姻的持续。婚姻持续的衡量一般为在一段时间内结婚的夫妻，婚姻持续10年，20年……甚至终身的比例。以美国和中国为例，若仅看粗离婚率，中国离婚率上升很快，目前甚至已经“赶英超美”。中国2019年的粗离婚率为千分之3.3，高于美国的千分之2.9。若看婚姻持续率，普林斯顿大学谢宇教授的一篇文章使用近几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美国在结婚5年后，超过10%的夫妻会离婚。结婚20年后，将近45%的人人会离婚。日本夫妻的20年离婚率则为15%。但中国人结婚后5年离婚比例低于3%，20年离婚比例也不到5%。即便是80后，也只有不到8%的人离婚。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实际上，中国的婚姻稳定性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真实离婚率是极低的。

这一点也可以从离婚人群在总体样本中占比得到侧面验证。联合国婚姻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50-64岁女性中处于离婚状态的接近20%，25岁以上其他年龄段中，离婚女性约占10%左右。与此相对应的2016年，中国全年龄段女性中处于离婚状态的均不到3%。

离婚程序：登记离婚易，诉讼离婚难

婚姻关系和家庭结构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家庭的稳定对整个社会有益，也因此，风俗和法律对于离婚往往有或严或松的条件要求。在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离婚都不是夫妻两个人说离就能离的，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和办理一定的手续。离婚的条件和手续的复杂性便体现了离婚的自由度。新中国离婚法和登记程序经历了几次重大修改，离婚自由度也经历了几度变迁。

中国实行双轨制的协议离婚制度，包括在婚姻登记机关通过行政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登记离婚）和诉至人民法院经法院调解解除婚姻关系（诉讼离婚）。目前，中国登记离婚的政策为2003年7月民政部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离婚的程序，使得离婚登记变得简单、容易。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是否感情破裂，离婚协议是否公平，离婚后对子女的安排是否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等均不作实质审查。在夫妻双方对离婚相关事务（包括是否离婚、孩子抚养、财产分割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登记离婚比

较容易，携带必要的证件即可当场离婚。

但是，如果夫妻二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存在家庭暴力、财产转移等情况，便需要采取诉讼离婚的方式离婚。以2017年为例，登记离婚为437.4万对，诉讼离婚约为140万件。也就是说，约有四分之一的离婚夫妻采取诉讼离婚的方式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在诉讼离婚中，有91%的离婚案件为夫妻双方只有一方想离婚，另外一方不同意离婚。

诉讼离婚手续相对复杂、时间长，并且不一定能离。目前法定离婚理由仅包括：分居满两年、一方存在家庭暴力、一方有婚外同居情形、赌博等。

虽然法律规定夫妻可以因为“感情破裂”离婚，但在现实中感情是否破裂却需要由法官来裁量。这不仅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判断，根据中国民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取决于原告的证据提供情况。在诉讼离婚中，法官往往需要认定夫妻双方的“感情破裂”不是短暂的，而是长久的、彻底的、没有和好可能的才会判决离婚。

根据《深圳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白皮书》，除了能证明存在上述法定准许离婚情形以外的离婚案件，“秉持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以及依法处理的原则，无法定准许离婚情形时一般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第二次起诉离婚需等待6个月。

多种因素综合下，目前诉讼离婚的一审“判离率”在35%左右。在深圳，所有准许离婚的案件中，第一次起诉与第二次起诉、第三次起诉分别占比为14%、85%、1%，大部分诉讼离婚成功的人都需要经历二次诉讼，历时超过一年。

《民法典》带来的改变：协议离婚变难，诉讼离婚变易

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规定，婚姻冷静期作用于协议离婚。婚姻冷静期实施后，协议离婚的程序增加，需要经过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

证)。如果在冷静期内其中一方反悔或对离婚协议不满意便需要重新谈判,增加了离婚的变数。在谈不拢的情况下,双方只能采取诉讼离婚的方式离婚。因此,在民法典实施后,采取协议离婚的夫妻应该会变少。

虽然协议离婚变难了,但是《民法典》又明确提出,“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民法典之前,离婚时间较为不确定性,想离婚的人无法预测离婚的进程。分居相对较为容易实现,虽然预期离婚时间仍然很长,但为想离婚的人提供了一个相对明确可以离婚的进程。

我们需要怎样的离婚政策?

有关离婚自由度大小,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间都争论激烈。诚然,对离婚自由进行适当的限制有助于稳定婚姻和家庭,而且有益于保障社会稳定。婚姻家庭政策既要符合促进家庭和谐、家庭功能有效发挥的目标,也要基于特定时期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条件。

现阶段,中国婚姻相对发达国家非常稳定,草率离婚并非普遍的严重问题,并且婚姻法已经为当事人离婚设定了一定程序和条件。突出问题在于,在家庭纠纷中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不够,许多人想离婚不敢离,诉讼离婚久调不决和判决时间长,对个人和社会利益损伤较大。如果进一步增加对离婚的限制,将会影响个人福利,甚至阻碍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因此,施策重点应在于保护家庭弱势群体的利益,尊重个人的自由意愿。

中立看待离婚问题,减少对离婚的污名化和歧视。幸福的婚姻是很多人的愿望和预期,但是,不幸的婚姻总会存在。这既是概率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婚姻的幸福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其中包括运气、性格、对婚姻预期的准确程度,也有双方的经营。离婚是认错和止损的一种方式,不应该被过度解读或简单地认为是好或坏。

将离婚的自主权交给当事人,减少对协议离婚的审核。

首先,目前家庭规模缩小,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个人追求自由、高质量的婚姻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第二,对于婚姻质量感知最准确是夫妻二人,其外的第三人有信息鸿沟,在短暂的审理(核)期内很难了解婚姻的全貌,缺乏做出是否离婚判断的完全信息和情感了解。

对于单方离婚的诉讼,提高一审判离率,简化诉讼离婚的调解程序、缩短诉讼离婚时间。首先,婚姻质量并非为二人在婚姻中效用的平均,而是取决于效用最低者。因此,即便是单方提出另一方不同意的离婚,也应尊重效用最低者的利益。其次,在通常的离婚案件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往往从婚姻中获益更小,更有可能提出离婚,而从婚姻中获益较多的那方更有可能不同意离婚。

在离婚谈判中,想更快结束婚姻关系的一方,更愿意为离婚做出妥协。因此,如果增加离婚的难度,或增加离婚的谈判时间,很有可能会导致相对弱势那方的利益受损。完善相关法律,增强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法院和民政机关的工作重点应从审核当事人是否“感情破裂”转移到帮助双方合理、公平地分配夫妻财产和抚养权,完善离婚后的扶养制度。目前,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往往存在“举证难”、“获得补偿难”的困境,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婚姻中弱势一方的权益保护问题需要各方面不断努力,不断完善。

家庭事务宜“疏”不宜“堵”,积极推广各阶段、多方面的家庭辅导。所有人际关系都需要双方的诚意、努力和沟通技巧,越亲密的关系,对维持关系的能力要求便越高。为未婚和已婚人群在感情经营、子女教育等问题上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培训,有助于帮其建立稳固、安全、幸福的婚姻关系。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

刘诗濛:为何高知女性单身比例高

作者:刘诗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王逸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20届硕士研究生)



“单身经济”,是指由单身人群崇尚高质量、高消费生活所带来的商机。现如今,单身经济涵盖了生活中吃穿用度各个方面。“一人份火锅”、“一人跟团游”等以单身人口为目标群体的消费方式逐渐兴起,标志着单身经济已经成为市场潮流之一,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热议。

“单身经济”的盛行,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单身人群日益增长现状。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其中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同年,智联招聘和珍爱网联合发布的《2018年职场人婚恋观调研报告》中指出68.33%职场人士处于单身状态。阿里巴巴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空巢青年图鉴》表明中国的独居青年群体超过半亿。

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在单身人群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智联招聘在2019年发布的《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指出,女性白领单身比例接近40%。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中国适婚男性数量应该多于女性,女性本应在婚姻市场占据“优势”。而作为女性中的精英阶级,高知女性竟然会有如此高的单身比例,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中国人口结构与婚姻市场的两个基本事实

01 高学历女性占比逐年上升,每年增量远超男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中国女性受教育水平逐年攀升。图1展示了2004至201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学校男女生占比的趋势变化。可以看到,女性在普通本专科学校学生中的占比随着时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普通本专科学学生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从2004年的45.65%上升到了2018年的52.54%。与男性横向对比,从2009年开始,本专科学校学生中女性的比例超过了男性,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越来越大。在2018年,高学历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差距达到了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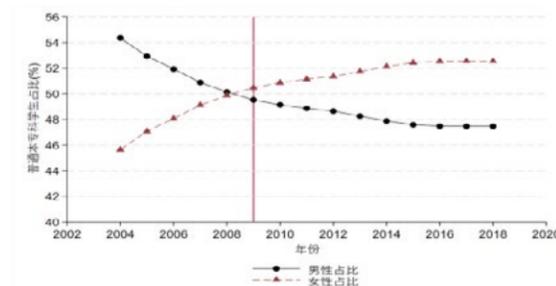


图1: 2004-201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学校男女生比重趋势图

图1的数据表明,从2009年开始,每年新增的高学历女性都比男性要多。考虑到大学毕业时大多数人刚好到了适婚的年龄,那么在婚姻市场上,适婚年龄的高学历女性的比例与绝对数量都从近十年开始慢慢超过男性。

02 适婚高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已超越男性，并在一线城市更为明显。

表1中展示了使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出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基本状况。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中国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2015年，全国50周岁以下妇女累积的生育子女性别比为114.48（即每出生114个男孩对应出生100个女孩），远超过联合国定义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区间（103到107）。其中，一线城市的生育人口性别比为122.57，出生人口结构更加失衡。这与我们普遍认为的中国男多女少观念相一致。

表1：2015年全国和一线城市人口结构基本状况

	累积出生人口性别比	适婚人口性别比	本科以上学历适婚人口性别比
全国	114.48	100.91	95.42
一线城市	122.57	105.87	92.99

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然而，出生人口比例并不能反映出当前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例。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的适婚人群性别比并未有严重失衡。2015年全国的适婚年龄段人口（22-32岁）性别比仅为100.91，基本满足1:1的要求。即使是在一线城市，适婚人口性别比也仅为105.87，并没有严重的结构失衡。这说明，在婚姻市场适婚年龄的女性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找到结婚对象，但依然处在优势地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女性白领单身现象如此普遍呢？考虑到女性很少匹配比自己学历低的男性，我们将女性白领的婚姻市场限定为本科以上学历适婚年龄的人口。表1第三列显示，全国本科及以上学历适婚人群性别比为95.42，出现了明显的“女多男少”的情况。这一现象在一线城市更为严重，本科及以上适婚年龄人口的性别比只有92.99。这些数据反映出高知女性在城市婚姻市场中处于“供给过剩”的状态。与传统的男多女少观念相悖，高知婚姻市场中，女性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高知女性的婚姻匹配偏好

婚姻匹配问题一直是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问题。Becker在1973和1974年发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两篇论文指出，婚姻市场上的男女都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方的个体特征（例如身高、种族、教育等）是决定男女匹配的重要因素，并且往往个体特征相似的单身男女更容易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

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婚姻匹配问题的理论，其中以“同质匹配”和“梯度匹配”最为著名。“同质匹配”指出，择偶双方往往会偏好选择个体特征相似的异性，例如工资收入、教育、性格等等。而“梯度匹配”则认为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人们往往偏好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异性作为结婚对象。因此，在面临婚姻匹配问题时，人们往往会选择至少和自己一样优秀的人作为结婚对象。

在中国，婚姻匹配还受到了传统婚恋文化的影响。“男高女低”等思想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择偶选择。男性为了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较高地位，倾向于“向下匹配”，即寻找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低或者具有同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作为伴侣，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仍然普遍。反观女性，她们更青睐于找社会经济地位优于自己的男性作为伴侣。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婚后女性需要负责维持家庭、照顾孩子等家务事。因此，为了保证安定、舒适的婚后生活，女性在挑选伴侣时会偏好物质条件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男性，即“向上匹配”。

因此，除了男女性别比的因素外，高知女性的高单身比例还与中国高知女性的婚姻匹配偏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婚恋文化和社会人口结构变动双重影响的结果。对高知女性而言，她们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得她们能够“向上”选择的范围较小，从而导致了更多的高知女性“被迫”选择单身。随着高学历女性占比的增加，使得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逐渐由“选择方”转变为“被选择方”。而大多数男性往往偏好于“向下匹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高知女性单身的现状。

传统婚恋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传统婚恋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多个方面。首先，女性“向上匹配”的偏好造成了单身群体的不断扩大。长远来看，这使得社会的生育率维持在低水平。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不仅加重了人口老龄化，还会影响社会未来的生产力水平。这将对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同质性婚姻匹配还会带来社会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一篇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经济学论文（Greenwood, Guner, Kocharkov, Santos; 2014）发现，男女双方择偶的正向选择，即同质性婚姻匹配是造成社会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随着社会对知识需求的提高以及竞争的增加，追求更高的学历已经成为大多数女性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但是，高学历只是追求幸福生活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束缚女性择偶选择的“枷锁”。从个体角度出发，人们的择偶标准应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变。除此之外，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政府可以考虑出台一系列的鼓励政策，缓解婚姻市场结构失衡的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李璐、曹美连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在财新网

韩昱洁、李金阳：一娃好还是多娃好？关于独生子女教育、性格、偏好和健康的优劣分析

作者：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李金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全面推进，家庭生育个数又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一个家庭，到底是生一个娃好还是多个娃好？如果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家长们最多讨论的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人力资本各方

面孰优孰劣，得出公认最多的一个结论——“独生子女更聪明但更自私”。长期以来，国内外人口学界和经济学界对于该问题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并从认知领域、非认知领域、长期影响这三方面围绕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讨论。

一娃更好：孩子数量对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重要的研究问题。Becker and Lewis提出了经典的数量质量替代模型（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theory），即如果一个家庭有更多的孩子，那么分摊到每个孩子身上的资源会更少，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更低。

在此理论基础上，后来的很多学者试图找到实证的证据来检验孩子的数量是否因数量增多而降低。考虑到孩子的数量不是随机的，可能受到很多影响孩子质量且不可观测控制的父母特征影响，同时孩子的数量也可能受到其质量的影响，许多学者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并利用了由双胞胎或先出生的孩子的性别构成导致的可能较外生的孩子数量来识别。此外，中国政府在1971年着手制订了计划生育政策来抑制过快的人口增长，而各地区对该政策执行力度的差别也被用来视为导致孩子数量变化且较为外生的因素。

上述研究关注了不同国家的情况，并未发现一致的结论。这可能因为在福利保障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例如挪威、德国，那里既有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大学学费免费），又有政府对于生产和育儿的慷慨支持（长时间的带薪产假以及育儿津贴），抚养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仅仅占一个家庭支出的一小部分，因此数量质量之间的替代不太明显。然而，在很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由于不完善的社会福利系统，育儿的成本主要由家长承担，因此更多的孩子个数会造成有限的家庭资源分配不足，使孩子成长质量下降。

仅利用中国数据的研究也发现了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增加孩子个数会对每个孩子考试成绩、接受教育时长、升学率、以及生理健康状况等方面有负面影响（如Rosenzweig and Zhang, 2009; Liu, 2014）。另一方面，有的研究并未发现负面影响，或指出负面影响很小（如Qian, 2009）。这些研究大多利用了双胞胎出生或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力度作为孩子数量不同的外生变动，而造成不一致结论的可能原因，除了估计方法不同外，还有可能因为（1）家庭内部将主要资源集中在个别孩子身上，而不是分散给所有孩子。数据证实家长倾向把资源集中在出生时就更优秀（健壮）的孩子身上，而之前出生的单胎哥哥姐姐的体重和资源禀赋大多强于后出生的双胞胎，故双胞胎出生后，父母会集中资源增加给哥哥姐姐的投资，从而减弱由双胞胎出生带来的对哥哥

姐姐人力资本的负效应；（2）孩子数量增加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即家长可以给孩子用哥哥姐姐的衣服、课本、房间，甚至可以陪所有孩子一起学习和玩耍，故并不会减弱对孩子的投入（Rosenzweig and Zhang, 2009）。

现在，受到宣传已久的“优生”思想以及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高昂的养育成本让“精英式”育娃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认可。如果养孩子的规模效应没有很大，或家长不倾向扩大孩子出生禀赋的差距，那一孩在教育 and 生理健康方面的表现的确更好。

“小皇帝” or “小公主”：独生子女行为差异和精神健康问题

家长们除了关心孩子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孩子的“软实力”和精神健康。

自从独生子女随政策实施大量出现，大量媒体的持续关注报道凸显了社会对独生子女的担忧。在报道中，独生子女通常被冠以关注自我的“小皇帝”或“小公主”，当独生子女们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更被贴上了“无吃苦精神，意志薄弱”等标签。这些担忧究竟是刻板印象还是确有其事？

因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一同分享父母的关爱，所以在家庭中，独生子女的父母可能会对孩子的需求更加敏感，这会带给孩子更大的安全感、信心和智力能力。然而，父母的更多关注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期望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压力。这对独生子女性格的养成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缺少兄弟姐妹在成长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陪伴，这可能使独生子女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合作，也不太愿意和同龄人相处。

Cameron 等（2013）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 Science 的研究利用经济学实验的方法对中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经济偏好和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该研究于2010年春季针对北京市城区1975、1978、1980年和1983年

出生的四个年龄段（前两个年龄段的被试者出生于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后两个年龄段的被试者出生于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后）共421位被试开展风险测度、信任博弈、独裁者博弈，以及竞争博弈四个实验，分别考察了两类人群在风险偏好、亲社会行为和竞争行为方面的差异。

该研究将1979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自然实验，采样地点选择在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北京市。通过将政策前与政策后的两个年龄段人群的经济行为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该研究能够识别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独生子女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且剥离了影响父母自由选择生育孩子的家庭背景特征等因素对两类人群的行为差异可能存在的混淆影响。

研究表明，在性格方面，独生子女更加悲观，专注力更低以及更加神经质；在经济偏好方面，独生子女表现出竞争性较弱、较不信任他人且也较不被他人所信任的特点，但两类群体在利他行为上不存在差异。

除了性格与经济行为偏好之间的差异，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精神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

有研究对比了9-17岁依赖组与18-26岁独立组的精神状况的差异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1987年）后（2006年）的区别。

图1描绘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1987年）后（2006年）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精神残疾率。由图1可见，18—26岁年龄组的人群相对于9—17岁年龄组的人群精神残疾率出现了较大的上升。并且，这种上升幅度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后出生的人群更显著。进一步比较男性和女性，可以得出，这种双重差异对于男性更显著。同时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政策越严格的地区，独立组相对于依赖组的精神残疾率上升幅度越明显。（谭之博，张晓波；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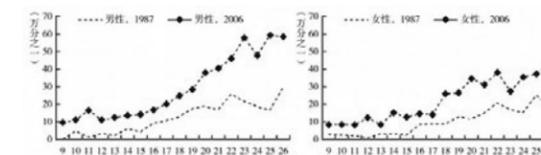


图1 1987年和2006年残疾人调查中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精神残疾率

图片来源：谭之博，张晓波；2016

造成该现象背后的逻辑是，独生子女政策制造大量所谓“小皇帝”，该群体在家庭中接受过分的保护和照顾，抗击挫折及压力的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长大成人，独自走向社会，突然面对升学、就业、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陡增的社会压力将使其精神难以适应，恶化其健康状况。同时，在中国，受到“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影响，男孩在家中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宠爱。另一方面，在传统观念中，男性走向社会后需要独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与走向独立之前的“温床”形成更加鲜明的反差。因此，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男性经历更大的压力冲击，因此对男性精神健康的影响比对女性更强。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减缓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从而降低人口对土地、环境压力的同时，也令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也在同步调整。家庭的生育数量也重新成为一个选择，一娃还是多娃好也成为更多爸妈的问题。从目前研究文献看来，确实“一娃更聪明但软实力更差”。然而，孩子生育数量还关系到家庭生活状况、收入状况和父母养老等多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爸妈们妥善考虑。

本文首发在界面新闻

好文回顾

20 世纪以来的在美华人：《排华法案》、
夹缝求生与社区支持

作者：刘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美国的华人而言颇为不易。除了疫情本身对经济和健康的冲击，他们还要面临“排华”阴霾的回潮。当地时间2020年3月16日，当美国新冠病毒每日确诊人数即将突破千人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中公然将病毒与中国相联，将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即“中国病毒”）。这一违反世界卫生组织命名规则又极具挑衅意味的言论不仅让大洋彼岸的中国愤而抗议，也给在美国的亚裔群体带来了极大影响。据网站“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Stop AAPI Hate）统计，在特朗普总统“中国病毒”推文出现的短短一周之内，针对亚裔群体的骚扰事件已高达673起，具体行为包括刻意冷落、言语攻击乃至肢体冲突。

美国的排华文化其实根植于历史。早在19世纪末，美国西部就爆发了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对在美华人劳工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产生了极大威胁，也直接促使了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过。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

种族的法案，从1882年通过至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让在美华人无法通过归化入籍，宛如漂泊的浮萍，无法在身份上融入美国社会。在美华人社区受到严重影响，华人人口数从1880年的105000人下降至1940年的77000人，且男性远多于女性。

不过，华人希望获得公民身份、争取自身权益的反抗从未停止。当官方途径无法走通时，华人移民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据统计，即使在《排华法案》生效期间，仍有30万中国移民获准进入美国，这还不算无法计数的非法移民。这些移民如何突破《排华法案》的严格限制进入美国？被排华氛围笼罩的美国社会如何看待这些移民？中国社区又如何给新移民提供支持？基于最近出版的关于在美华人的一系列著作，本文简要回顾20世纪在美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对期待移民美国的华人来说，为了合法进入美国，他们往往不得不依赖假身份，并终身生活在身份造假的恐惧中；而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非法偷渡，不仅需要背负高额债务，也将自己的生活领地限制在了唐人街的一方天地。但翻阅历史也可以看到，面对官方的严苛制度，夹缝中求生存者的迫切渴望让华人群体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同乡、熟人以及自发形成的华人社区都为移民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帮助。

1 绕开《排华法案》：伪造身份的幸运与阴影

“屈指经数月，尚在此路头。”

——《枕底无花梦不香：天使岛中国移民的诗歌与历史》

《排华法案》仅对极小部分需要入境美国的华人有所豁免，其中包括返回的美国公民、政府官员、商人、学生、教师和旅行者。因此对于希望移民美国的华人来说，伪造文件、谎称自己属于被豁免的类别成为了最为常用的手段之一。谭业精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谭业精于1905年生于广东香山（现中山市），他的父亲谭发光通过偷渡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到美国的人，在农场打工并汇款回家。1920年，由于父亲遭遇车祸去世，家族希望送谭业精去美国继续闯荡。为了获取在美国的身份，他支付了1900美元获取了伪造的身份证明（被称为“假纸”），谎称自己是广东新会人，是加州Stockton一位商人杨栋的儿子，名为杨庭顺——希望作为在美华商家属获取移民美国的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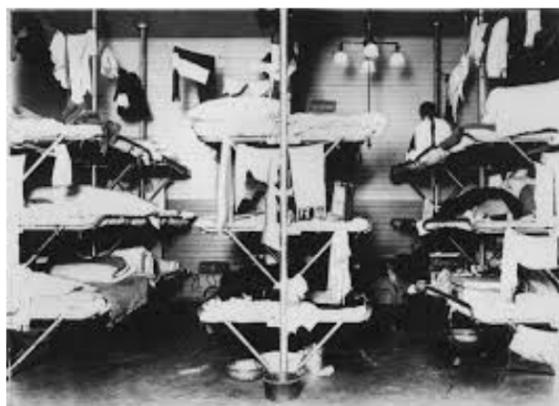
据估计，这段时间里，由于《排华法案》的限制，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中持有假证件的比例超过了90%。他们常用的方式是谎称自己是已移民华人的亲属，或婴儿时期生于美国。不少伪造证件的案例依托熟人或亲属，但也有不少需要依赖陌生人。由于大多数早期华人均来自广东省，《排华法案》存续期间的移民也以广东人士居多。

花钱购买伪造的证件仅仅是第一步。当攒齐旅费并获取“假纸”之后，对这些移民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旧金山的天使岛（Angel Island）与纽约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曾是20世纪初美国接待移民的主要地点，而与欢迎欧洲移民的埃利斯岛不同，天使岛作为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的主要入境口岸，推行的政策则是“将亚洲人排除在外”。1910年至1940年的三十年间，来自中国的10万移民曾由此岛入境美国。仅有约一半华人在抵达当天被允许入境，剩下的人则被扣押在天使岛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以核实身份资料。

在当代，美国海关的扣押和检查通常发生在入境处的小房间；尽管等待的时间里依旧煎熬，多数检查还是会在一两个小时内结束。但回到100年前，被扣押的华人移民则会被长期拘留在天使岛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询问。由于移民官员毫无理由地怀疑移民身上可能携带传染病，当局在中国移民抵达当天会首先进行详细的体检，有些体检项目甚至要求移民脱光衣服。之后是由移民局官员对移民及证人的询问，以核实移民的身份资料。此时除了详细的相关文件证明，还需要两个可靠的证人——比如文件中的父母、兄弟、邻居，以便交叉询问。在涉及家庭关系的审查时间问则尤其严格：移民局的官员会询问数十个甚至上百个的家庭细节问题，以找到证词中是否存在出入，从而判定亲属关系是否存在。比如，借杨庭顺之名的谭业精的证人是“假纸”父亲和“假纸”兄弟。他的“假纸”兄弟杨庭标曾被问及“祠堂有几个门”、“门楣上有没有祠堂名称”、“祠堂是用什么材料建成的”等一系列极其细节的问题，而这在此类审讯中极为常见。为了应对这些提问，持有非法证件的移民和帮助作证的证人常常需要提前准备好“辅导手册”，在路途上反复研习，并在登岸之前将其销毁。如果移民官员判定移民与证人的证词相符，移民即可获准进入美国。

等待审问的过程是艰难的。天使岛常年关着二三百名男子与三五十名妇女。与一同前来且被扣押的日本人或俄罗斯人相比，中国人被扣押的比例更大、关押的时间更长，数周至数月十分常见。如果询问后被判无法入境，移民可以选择上诉，这也会进一步延长他们的拘留时间。据统计，1910年至1940年，拘留时间的中位数为16天。拘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由Kong Din Quong保持，为756天。还有56个人在天使岛关押期间去世。最终，约95%的人会被获准入境，剩余的人则会被遣返。

尽管大多数人会被获准入境，但是天使岛的经历并不如它的名字那般美好。中国移民被关在大房间里，住狭窄的上中下铺，房间阴暗而拥挤。他们每天伴随着警钟起床，在饭堂用三餐，晚上听到熄灯号之后休息。他们可以在有限的场地上进行户外活动或者阅读书报，但依旧很难排解前途未卜的煎熬与监狱般关押生活的无聊。由于伙食简单甚至难以下咽，在1916年和1919年还曾出现因移民对伙食不满引发的骚乱。



天使岛上中国移民的居住环境

直到1940年11月，一场大火让移民局放弃了天使岛拘留所。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在军队服役的华人率先获得在美国公民身份，并获准把配偶接到自己身边。但是，《排华法案》存续期间伪造证件的过往，让诸多中国移民一生背负证件造假的原罪和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20世纪50年代，美国移民局希望清理“假仔”（即通过假证件获得公民权的人），鼓励证件造假人士主动坦白，并试图惩罚拒绝坦白的人士。由于“假纸”关系常常盘根错节，一家人的坦白可能影响到相关的多户人家，这一政策引起华人社区的巨大震动。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移民局对不少华人居民进行随意扣押和诘问，也将华人重新推入恐慌。直到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给每个地区20000个移民配额，当时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人移民才获得了与其他地区移民平等对待的资格。

20世纪在美华人的生存之道：唐人街提供的社区支持

“曼哈顿唐人街作为纽约市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和小意大利、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和华尔街齐名。”

——Kenneth J Guest, 《从勿街到东百老汇大街：福州移民和纽约唐人街的复兴》

对当代留美学生和访美游客而言，唐人街是破旧的：狭窄的街道、传统的粤式菜肴、随处可见的红底金漆繁体字招牌，让唐人街宛然便是上个世纪的遗产。诚然，当下众多中产阶级移民削弱了唐人街作为华人社区与中国移民的连接，租金上涨也让古老的唐人街店铺面临生存危机；然而，对早期华人移民来说，唐人街通常是他们入境美国之后的第一站，是这些“新客”们的避风港，甚至成为很多早期移民赴美之后数十年的主要活动区域。



纽约唐人街

早期移民通常语言不通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极其依赖唐人街的支持。例如，旧金山的华人社区会为被扣押在天使岛的华人教授英语并提供留声机等娱乐设施。当移民顺利进入美国之后，他们的工作和住所也往往以唐人街为中心。以谭业精为例，他刚刚来到美国在美国家庭做男仆，同时参加了英语学习班，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在亲戚的介绍下，他先后在花卉农场浇花、在唐人街的餐馆洗盘碗。十几年后，他初入美国的妻子也在唐人街的制衣厂工作。可以说，唐人街为早期在美华人提供了便宜的住房和工作机会，为早期移民融入美国社会提供了桥梁作用，依托唐人街的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也提供了华人在美国生存的社会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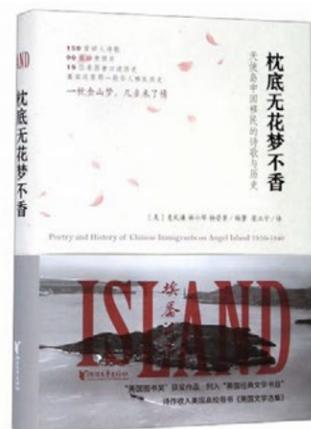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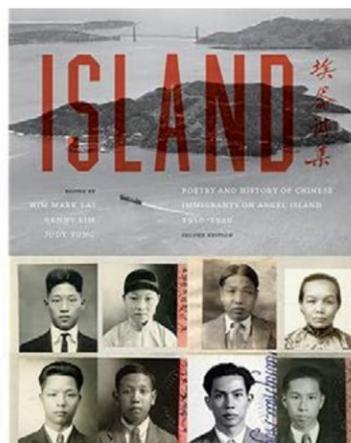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由于《排华法案》的限制，受到良好教育的美籍华人也很难完全摆脱唐人街的影响。这一部分华人是早期美国移民的后裔，因出生于美国而获得美国公民权。尽管看起来不需要背负伪造身份的风险也没有语言障碍，但《排华法案》引发的社会风潮同样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以1902年出生并成长在唐人街、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华镇牧师为例，由于东方人的面孔让他在美国人的公司求职时倍受歧视，他只能通过华人教会试图在移民局求一份差事。好在唐人街的成长经历也让他得以熟练使用广东各地的方言，最终在天使岛成为一名口译员。

除了为合法移民提供住所和介绍工作，唐人街更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在于吸纳大量非法移民，让几条看似平静的街道与非法移民、帮会甚至犯罪连在一起。《排华法案》的颁布让偷渡成为一门利润颇丰的生意：早在1889年，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就在奏折中提及“无赖洋人纠合华人，在香港设立行店，包揽出洋。其包至美国者，每人一百七十元……每年至少以五千人计之”，且获利后与旧金山的华人会党分成。即使在《排华法案》废除之后，偷渡的生意也没有停止。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中美邦交正常化，大量合法移民进入美国，而美国的高工资同时也吸引着更多偷渡客。此时的唐人街社区会为新移民介绍工作：在位于有“福州街”之称的纽约东百老汇（East Broadway），就业中介负责将工人和全美各地的店铺牵线；而福州商人经营的横跨美国各州的长途巴士运输系统，则可以让工人仅通过工作地点的简单地区代码就能搭乘巴士抵达美国的各个角落。

由于偷渡客往往语言不通、背负高额债务又畏惧自己身份暴露，他们成为了洗衣房、餐馆和工厂的理想廉价劳动力。以制衣厂为例，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纽约本地的制衣业迁移至海外，大量廉价制衣厂为了降低成本搬至唐人街。20世纪80年代时这些工厂雇佣了大量年轻女工。这些女工的工作时间长达每周6至7天，每日工作时间为10-12个小时，而她们的工资收入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还经常被拖欠。但是，受制于非法身份和语言不通，工人们也常常无法反抗。

在20世纪的非法移民史上，最为传奇的事件之一是1993年6月6日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在皇后区的洛克威（Rockaway Peninsula）海滩搁浅，10人在试图游泳登岸的过程中丧生。这一事件让船中三百名来自福建的非法移民和背后的偷渡网络暴露于大众视野中。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了由“萍姐”（真名郑翠萍）——一个1981年来到美国、生活在唐人街的福建移民，有着和善的面容和蹩脚的英语——经营的庞大的偷渡组织。萍姐以每人三万美元左右的价格收取费用、设计路线，并为到达美国的移民提供工作机会，也帮助这些移民往中国汇款并从中抽成。东窗事发后，萍姐逃出美国，继续自己的蛇头生意。在协助了至少5000人偷渡美国并积累了至少2.5亿人民币的财富之后，萍姐最终于2000年在香港被捕，被判监禁35年，并于2014年死于监狱。当然，偷渡的生意并没有因萍姐的被抓而停止，偷渡的路线愈加艰险，费用也在逐年上涨。时至今日，仍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人怀揣梦想、前赴后继地以各种方式来到美国，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美国梦”。

在美华人的经历充分说明，当官方渠道受限时，华人努力通过基于血缘、同乡或社区等非正式制度与官方制度对抗。借用哈佛大学明史专家宋怡明教授新著的标题，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被统治的艺术”，展示出了华人群体非同寻常的灵活与韧性。当然，非正式制度也并不能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移民有时不得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一书书影，右侧为中文版

2010年，在美华人的数目已经从1950年代的11.8万人增长至330万人。在排华法案颁布130周年的2012年，由首位当选美国国内议员的华人女性赵美心发起，美国国会终于对《排华法案》表示歉意，历史上的排华伤痕终于在表面上得以化解。如今，在美华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以各种方式融入了美国的点滴生活。但是，仅仅过去了不到1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危机让美国的华裔群体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其实，移民作为弱势群体，通常只是社会危机下民众情绪的出口；而转移矛盾、排斥异族也从来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幸运的是，当下的美国华裔不再是一百年前语言文化不通的外来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发声，强调美国正确应对疫情的方式绝不应该是各族间的相互仇恨，而应该是联手合作。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再回到一百年前假托“杨庭顺”之名移民美国的谭业精身上。他在“假纸”父亲和“假纸”兄弟的帮助下顺利进入美国开始打工。赴美16年后，他攒够了钱得以回国娶妻，又借钱获得商人身份让自己的

妻子和孩子移民美国。然而当初的假名和假身份伴随了他的余生。他与妻子赵罗英一起生育了六个孩子，都只能以杨为姓，他也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说出自己姓谭的事实。六个孩子之一的杨碧芳（Judy Yung）后来成为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美国研究系的教授，主攻亚裔美国史，并于1980年与同为在美华人后裔的麦礼谦和林小琴编译出版了天使岛上被拘留华人的诗歌集（中译本名为《枕底无花梦不香》）。诗歌集中收录了天使岛现存的135首诗歌与39段口述历史，包括对自己的父亲谭业精的访谈，试图全面反映20世纪初早期华人移民历尽艰险前往美国的过往。半个多世纪之后，谭业精的真实身份和过往终于以这种方式为后人所知。2020年12月14日，在父亲谭业精移民美国整整一百年之后，致力亚裔美国人研究的杨碧芳教授也在旧金山的家中去世，享年74岁。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

疫情防控需关注“系统性风险”城市

作者：史炜（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邱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于培（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21届硕士研究生）



去年12月以来，我国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等多地先后爆发本土传播的疫情。石家庄自2021年1月2日报告首例本土病例，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在短短几天内快速增长，石家庄市藁城区、新乐市相继调整为高风险区。为防止疫情扩散，1月6日起石家庄开展全员核酸检测，1月7日明确全市车辆及人员不得出市。随后陕西、湖北、贵州等地均出现河北关联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变得严峻。

在下图中我们整理了近期与河北省疫情有关的一些事件和政策措施的时间线。人口流动是疫情扩散的主要途径，为降低城市间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各城市也针对本轮疫情出台防控政策。针对人口流动的防疫措施可归纳从人口流出地（出发地）和流入地（到达地）两个角度归纳。比如从流出地的角度，主要为高风险地区人员原则上不能离开；从流入地的角度，北京对于来自特定中高风险地区的来京人员予以劝返，其他大多数城市对中高风险地区流入人员采取隔离、核酸检测，农村地区要求返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和居家健康监测等措施。春运期间，人口流动量大，再加上冬季的不利气候条件等因素，我国疫情防控面临压力。



人口流动网络的特征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使得个体的旅行行为可以较为准确和低成本地记录。将个体信息加总后，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度量人口流动的数据。比如通过百度迁徙指数 [1]，人们可以了解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强度，为个体出行计划、区域经济发展等提供参考信息。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百度迁徙数据提供了及时的（数据更新的滞后时间仅为1天）和颗粒度较高的（地级市层面）反映人口流动的数据，为很多关于疫情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

今年石家庄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数从1月5日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迅速增加。以1月5日为节点，我们分析了2020年12月23日-2021年1月5日这14天的百度迁徙指数，计算了这段时间内我国城市间的平均人口流动强度。将人口流动强度转化为

人口流量 [2] 并除以出发地人口数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人口迁徙率矩阵，其中每一项反映了从流出地到流入地在这段时间的平均迁徙率，即平均每天多少比例的流出地人口迁移到了流入地。

媒体聚焦

我院张思思副教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



近日，我院副院长、副教授张思思接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采访，讨论中国房地产业长期发展等问题。她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政府运用了很多政策杠杆去调控 (“The property sector really is healthier than it used to be. The government has so many levers now,” says Zhang Sisi of Jin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不单是靠住建部的监管，也需要其它政府部门的配合。比如学区房炒作的根源是教育资源的匮乏 (“Sometimes it takes the education ministry, not the housing ministry, to fix problems in the housing market,” says Ms Zhang.)。

上述报道发表于《经济学人》1月30日-2月5日刊物上。下图为杂志报道截图：



关于《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是由英国经济学人集团出版的杂志，创办于1843年9月，是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时政杂志之一。2012年1月28日，《经济学人》开辟了中国专栏，为有关中国的文章提供更多的版面。2018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世界品牌500强》榜单，《经济学人》排名第381。

本文首发在经济学人官网

《东莞日报》访卢晶亮：如何创新支持小微企业



编者按：

近日，我院副院长、副教授卢晶亮接受《东莞日报》采访，谈如何能够创新举措，支持小微企业复苏发展。他表示：“政府可以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给予小微企业更多的支持，目前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很多企业开始发展线上销售平台，这也更符合疫情时期消费者的需求。”

以下为采访原文：

小微企业对国计民生功不可没

Q：请谈一谈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作用。这一市场主体对百姓生活、经济发展分别有何影响？

卢晶亮：小微企业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首先，小微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承载者。从单位资金投入可吸纳的劳动力人数看，相同资金投入，小微企业可吸纳劳动力数量最高，平均比大中型企业多出4倍到5倍。

其次，中小企业是推动中国创新转型的重要力量，根据相关数据测算，我国60%以上的专利申请、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来源于非公有制经济，这其中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功不可没。

此外，小微企业是培育企业家的摇篮，有助于培育企业家队伍，造就大型企业，使得一大批有较高素质的企业家和地方骨干企业脱颖而出。

小微企业还能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由于小微企业所从事的行业，绝大多数分布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建筑业、日用品工业、商品批发和零售、餐饮住宿、美容美发等服务行业领域，对改善城乡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小微企业发展需更多“活水”支持

Q：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小微企业受到明显冲击，尽管我国已经基本上进入“后疫情时代”，但小微企业的复苏发展仍需呵护，还需要政策等各方面“活水”加以持续接济。您认为政府应该给予小微企业哪些支持？

卢晶亮：首先，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是很必要的，降低税收额度，减免租金可以让这些企业稍缓一口气，对企业工人发放“留岗留薪”补助也可以稳住企业的生产劳动力，让企业有能力重新投入新的生产中。其次，继续保持贷款扶持、优化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允许小微企业续贷和提升贷款额度，让企业有资金继续发展。此外，拉动消费是直接帮助企业复苏的“活水”，例如，东莞2020年实施的“乐购东莞”促消费活动，不仅市级财政投入支持，还鼓励各镇街一同参与，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小微企业的生产发展，应该继续保持。

在后续的发展中，参照北京等地的做法，政府还可以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给予小微企业更多的支持，目前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很多企业开始发展线上销售平台，这也更符合疫情时期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政府还可以鼓励和补贴直播电商等行为，让企业积极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在大数据时代为小微企业的复苏发展发掘出一条新道路。

扶持举措既要阳光普照，也要重点培养

Q: 有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3年左右，因此，在政策“及时雨”发力解决小微企业“近渴”的同时，如何利用好窗口期解决我国小微企业长期

以来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是需要全社会认真思考的话题。降低小微企业的“死亡率”，企业能做什么？政府如何打出深层次组合拳，解小微企业生存之渴？

卢晶亮：我认为，首先，在资金支持方面，更多地探索适合本地小微企业特点的金融服务。其次，改善小微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可以搭建专门服务小微企业的信息平台，提供及时的行业发展信息、政府专项补贴信息、招标信息、法律援助等支持与服务，帮助一批小微企业成长起来。

本文首发在《东莞日报》

《羊城晚报》访我院卢晶亮副教授，谈付费实习乱象

近日，我院副院长、副教授卢晶亮接受《羊城晚报》采访，谈“付费实习”乱象。卢晶亮认为，出现付费实习的现象是因为目前学生的求职压力增大，普通学校的大学生想要拿到热门行业、企业的实习资格比较困难，一些中介机构利用这部分学生的心理进行牟利。

卢晶亮建议，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要有长远规划，对自身的能力也要有正确评估。“一方面学校的就业服务机构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多实习信息，另一方面学生要多利用一些社会网络，比如学长学姐的实习信息交流群。”

以下为《羊城晚报》报道截图：



本文首发在《羊城晚报》

传统菜市场如何自救? 《时代周报》访刘诗濛

延伸阅读

11月11日，《广州日报》采访了刘诗濛、武文杰，就菜市场的变迁、转型展开了讨论。

刘诗濛表示：“菜市场对于城市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是一个公共设施，可以满足周边市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第二，它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每个地方的菜市场文化都不同，从商品到人们的销售手段，再到摆设，都是有地方特色的；第三，菜市场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交场所，就跟传统的公园一样。这是大部分菜市场都具备的功能。而在国外，菜市场还有可能会被打造成一个城市名片，类似于跳蚤市场、集市等。我们可以用大型超市类比菜市场，可以看到，即便如今电商如此成熟，但超市并没有消失，因此我认为菜市场也不太可能消失。但是如果想要长期存在，菜市场肯定是需要转型，从而找到跟网上买菜的差异化优势。”刘诗濛称。

刘诗濛认为，如今菜市场这一传统行业的发展障碍，除了网络平台冲击和人们生活购物习惯变化之外，还包括菜市场自身经营的存在问题，如成本高、非规模经济存在低效率、可替代性强等。因此，如果菜市场想要生存下去，转型必不可少，而其转型方向也像大型超市一样，一方面会与网络购买平台协同，担起一部分存储功能，同时需要保留并放大菜市场原本的城市文化、社交场所、休闲等差异化功能，也由此对菜市场的升级改造提出要求：不仅在硬件上需要有区别于以往“脏乱差”的形象，形成如猎德新街市那样的“新型菜市场”，同时还需要培养“新型摊贩”，这就需要政府或者是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企业去为想转型的摊贩提供再教育的机会，而对于想要转业的摊贩，则需要提供一些信息资讯来帮助其再就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充分的给他们不同方向的选择，但同时也不能过于超越市场化力量地去给予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刘诗濛说。

本文首发在《时代周报》



编者按

在互联网巨头的不设限“烧钱”投入下，社区团购迅速侵占了现代人的餐桌。原本从菜市场新鲜采购的蔬菜肉类，被人们放进了手机APP的购物车里：下单购买，送货上门。

代表传统生活方式的菜市场在呼救。

近日，我院助理教授刘诗濛、经济学院教授武文杰接受《时代周报》采访，对“菜市场如何自救”发表看法。以下为《时代周报》采访原文：

刘诗濛：菜市场需要找到差异化与服务型

“菜市场的转型与升级，需要找到差异化与服务性，挖掘文化底蕴。”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教授刘诗濛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广州菜市场有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但菜市场只是发挥简单的买菜功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必定会被淘汰。“为什么说一定要在线下才能得到更好的服务体验呢，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菜市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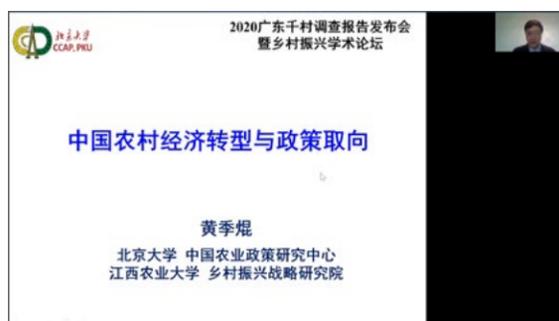
暨济一堂

2020 广东千村调查报告发布会暨乡村振兴学术论坛主旨演讲摘编

2021年1月16日，我院举办了“2020广东千村调查报告发布会暨乡村振兴学术论坛”。论坛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会上，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志钢，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罗必良分别作主旨演讲。

以下为三位嘉宾的发言摘编：

黄季焜：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政策取向



黄季焜教授的主旨演讲介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未来的政策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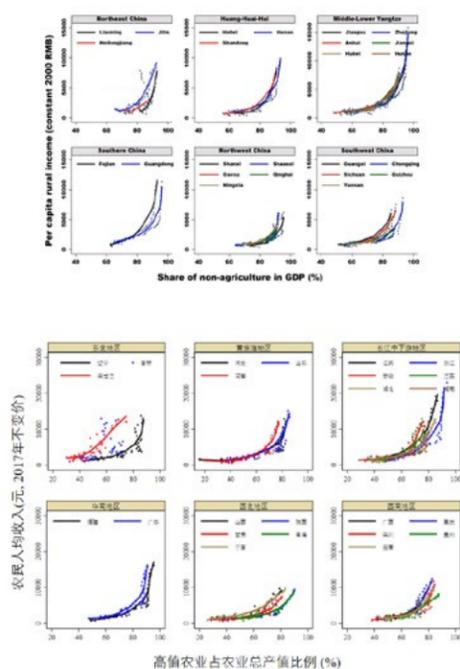
我国农业经济正在进行转型。过去4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4%，其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3%，对农业总产值贡献率达56%。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加速了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而增加全要素增长率的主要驱动力为制度创新、技术进步、

市场改革和农业投入。目前我国农业经济正在向高值农业、非农就业、“可持续+城乡融合”的方向转型。

黄季焜教授的研究显示，农业经济转型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图1）。数据显示，高值农业（蔬果、畜产品和水产品）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越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也越高。从各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农业就业和农业GDP的数据变化可以看出，农业GDP占比、农业就业占比逐渐下降且趋同，而非农就业的比例则持续增长。黄季焜教授认为，这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

（高值农业：蔬果、畜产品和水产品等）

1978-2017年 结构转型水平与农民人均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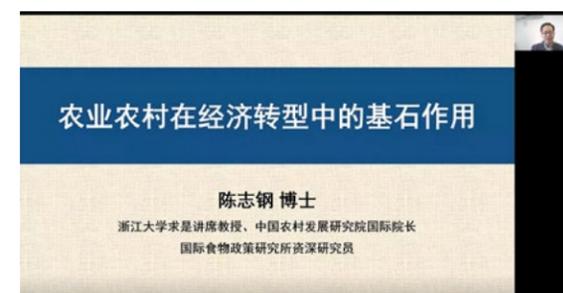


对比我国各地区农业转型和结构转型的现状，浙江和福建的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速度比较快，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率比较高；而广东和广西的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速度比较慢，农民收入增速比较低。广东三个指标的变化都较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初期广东的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和农民收入都相对较高，所以增收较慢。对比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中国和越南的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较快，农民增收和减贫速度也较快，而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则相对较慢。这些地区的发展历程验证了，农业经济转型与农民收入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成立。

黄季焜教授进一步指出，只有当农业GDP占比约等于农业就业占比，我国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或劳动收入）才能趋同。他还提出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愿景：农业劳动力要大幅度减少数量，并不断提高素质；养殖业全面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转型；种植业遵循“二八定律”（20%农民生产、80%农产品），社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最后，黄季焜教授提出了一些未来的政策取向：一是在保障粮食安全情况下，农业逐渐向高效高质多功能的高值农业与永续发展方向转型；二是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力和水土资源生产力；三是加速城镇化进程，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投资创新，从而加速经济结构转型，促进非农就业大幅提升和农村经济转型。

陈志钢：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在经济转型中的基石作用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转型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城镇化持续推进，预计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达70%；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面临人口结构老龄化、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差

距显著等挑战。陈志钢教授的主旨演讲指出农业具有非常高的韧性，农业-食物系统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农村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基石作用。

首先，农业-食物系统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往往被低估。陈志钢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从农业产业价值链角度对农业的贡献进行重新估算，结果显示，尽管2017年全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7.9%，但农业-食物系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3.3%；农业就业比重为27%，农业-食物系统就业所占比重为32.6%。其次，农业是具有非常高韧性的产业。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的研究显示，不同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农业的增长均显著高于非农产业的增长，许多国家将农业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

因此，疫情冲击下，中国农业-食物系统起到“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有研究显示，相对其他制造产业，农业-食物系统受到疫情的冲击较小。农业-食物系统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对其他行业较小，出口占总产出比重和进口占总需求比重均小于5%。此外，疫情期间，部分劳动力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食物系统又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

同时也不可忽视的是，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收入不平衡、农民工就业脆弱、留守儿童发展受限、粮食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挑战。第一，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约为2.6倍，低收入群体也主要分布在农村。陈志钢教授和其团队的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城镇居民。第二，疫情对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造成的冲击最大，而这些行业又往往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工，农民工成为脆弱群体。第三，2016年，全国有902万不满16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有36万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留守儿童的4%）无人监护。由于缺乏照料，留守儿童的能力发展受到限制，能力发展滞后，并且有加剧趋势。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第四，当前，中国主粮进口依赖度并不高，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收入水平提高，食物需求峰值还未到来，气候变化与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会对我国粮食系统形成一定冲击。

最后,陈志刚教授指出,需要构建一个高效高产、低碳、营养健康、具有韧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农业-食物系统,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冲击。而这其中的关键是私营部门投资,可以利用混合融资模式、过渡性金融、绿色或韧性基金、信贷补贴等渠道,为有韧性的食物系统提供资金。

罗必良:乡村振兴的可能性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须振兴。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大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如何理解五大振兴之间的关系,如何推进农业生态发展的产业化与生态品交易的市场化是当前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的重要现实关切。罗必良教授从制度和产权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

首先,罗必良教授阐述了他对五大振兴的理解。就产业振兴而言,罗必良教授认为要分清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还是结果,他认为在没有要素流动(尤其是现代经济要素进入市场)的条件下,实现产业振兴的难度较大。但是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村存在“门槛效应”,当前分散化、小规模农业经营格局并不具备前提条件。就组织振兴而言,依存、互助、封闭情境下反复博弈形成的诚实与信任,是传统村庄重要的道德资源。宗族、乡绅、长辈,曾经是传统村落维持秩序的重要政治资源。然而,人口流动导致的依存关系弱化、外出务工导致的家庭细胞分裂、社区开放导致的差序格局解构——意味着

传统组织资源的耗散,从自治组织走向权力嵌入的等级体制构造,可能意味着高昂的治理成本。就人才振兴而言,罗必良教授指出人才流动是追寻机会的,当前具有比较劣势的农产品生产、平面产业的非集聚经济,无法吸引投资和人才。事实上,人力资本流失、农村老龄化、妇女化、劳动力弱质化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基本形态。罗必良教授认为,与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相比,或许文化和生态振兴才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与城市相比,农村在生态与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因此,罗必良教授指出以生态振兴(绿色、生态与空间)、文化振兴(寻根、乡愁、感悟)带动要素投入、人才引进、产业振兴以及组织化重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线索。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后工业化时代来临,优美环境、绿水青山、乡愁家味越来越成为相对稀缺的资源,乡村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价值正不断凸显。之所以强调生态与文化的重要性,是因为发展的转型。然而生态、文化作为“功能性物品”,要实现市场化交易具有一定难度,难境在于:

1. 人格化问题。农耕文化中的传统技艺、民俗以及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行为主体具有不可分性,表现出人格化产权特性。
2. 物格化问题。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产品特性(“南橘北枳”)、不同的生态景观、不同的农耕文化与传承,因资产专用性、地理专用性与空间依赖性,表现出“物格化”产权特性。
3. 相互性问题。一方面是多元素的相互关联性,另一方面因审美与感悟而具有情境关联性,表现出功能属性不可分的产权特性。由此导致的显著特征是产权主体与产权客体的不可分、功能属性与生产环境的不可分、功能属性相互间的不可分,并进一步在消费层面上表现出公共性与外部性(资格的非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当村落、山水、田园分属于不同行为主体时,如何做到“总体价值最大化”,罗必良教授提出了“功能品交易”的市场设计策略。他认为市场设计过程的本质就是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发现价格,农业生态品的功能特性与频谱资源特性有着十分接近的性质。借鉴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设计的无线电频谱牌照拍卖机制,竞争性拍卖有助于实现最高期望收益。最后,罗必良教授提出他的

政策建议,即在一个特定区域中,可以基于农业功能进行分区,每一个功能区就类似于一个频谱牌照,那么就可以采用同步增价多轮拍卖方案,最大化功能品潜在价值——从而鼓励企业家与社会资本的农业农村进入及多样的功能性开发,走出一条产业化、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的乡村振兴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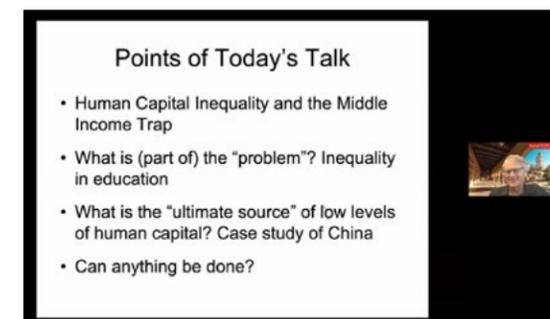
Scott Rozelle: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以及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挑战



人物名片

Scott Rozelle 教授是斯坦福大学 Freeman Spogli 国际研究所 Helen Farnsworth 资深研究员,也是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的共同负责人之一。

近日, Scott Rozelle 教授于线上平台进行了题为“Rural China's Human Capital and Challenges to the Economy's Long-term Stability Growth”的主题讲座。



Scott Rozelle教授在线上会议室

在讲座中, Rozelle 教授从农村人力资本发展的角度讨论中国长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他首先描述了地区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然后解释人力资本积累不平等的原因;最后,针对解决中国城乡人力资本积累不平等的问题, Rozelle 教授提出了相应建议。

首先, Rozelle 教授介绍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个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受限,无法跃升到高收入水平阶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 21 世纪期间,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而土耳其、墨西哥、巴西等地区的人均收入始终处于中等水平,

无法跨越到更高的收入水平。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地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Rozelle 教授指出，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中，接受了高中教育的劳动力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劳动力的特征会从“低工资、低技能”向“高工资、高技能”进行转变。然而，低素质的劳动力不能满足此种转变，大量劳动力面临失业风险。失业人口使得社会治安变差；没有高素质劳动力的支持，地区引入投资的可能性降低。这些情况会导致地区无法实现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中国大陆是目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之一。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本水平排在世界中等收入地区的末尾。为了提高中国人力资本的水平，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5 年到 2014 年，进入高中校园的新增学生数量超过 1 百万人。但是，距离普及高中教育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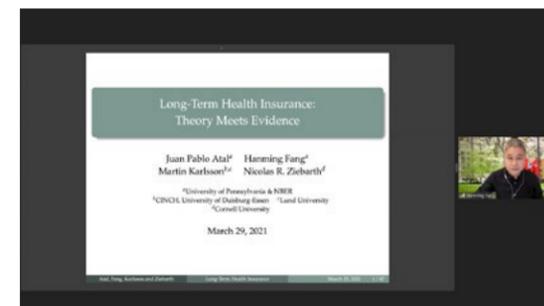
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众多因素相关，而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城乡差异是重要原因。在拥有城市户口的 15-17 岁的人口，93% 有高中学历，而农村户口中的比例为 70%；在中国的大城市，约 90% 的学生会进入高中校园，而农村贫困地区，只有约 50% 的学生会接受高中教育。城乡教育不公平从就业和工资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经济。2004 年到 2017 年间，能享受社保的正规就业比重不断下降，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比重迅速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就业规模增速远高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变动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两极化，降低了平均工资水平。2013 年到 2018 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长水平比 GDP 增速低 13%。

针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问题，Rozelle 教授提出中国政府面临的两个挑战：一是让农村地区的学生进入高中，二是确保农村地区学生进入高中之后有足够的学习能力。Rozelle 教授负责的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项目曾在中国农村的初中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部分初中学生的认知能力让他们无法学习。他们进行的智商测试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农村初中学生的智商水平低于平均值。这些认知能力较低的学生无法接受高强度的教学节奏和课程安排，导致他们没有能力学习更多知识。

若认知能力的差异是教育不公平现象的根源，要如何解决认知能力的问题？一部分研究表明要提高农村儿童的健康水平。60%-65% 的农村儿童有贫血、寄生虫疾病和近视的困扰。在接受了相关治疗后，大部分孩子的学习能力得到提升。而另一部分研究指出，0 到 3 岁儿童的营养环境和父母教育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Rozelle 教授的项目组对中国 0-3 岁的儿童进行了认知能力的测试。测试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儿童的认知能力水平与全球儿童认知水平的平均值相同，但在农村地区，超过一半儿童的认知能力低下。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机构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培训项目，鼓励中国农村家庭关注儿童认知能力。这些项目鼓励中国农村的父母加强与 0-3 岁儿童的对话和交流，以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Rozelle 教授期望这些项目能够提高中国农村地区儿童的认知能力，从而提升农村户口人群的人力资本水平，为中国地区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

讲座最后，Rozelle 教授与参会人员积极互动，讲座气氛热烈。针对农村地区的父母忙于工作而没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儿童的问题，他提到了巴西的措施。巴西会给两岁之前儿童的母亲提供补贴，鼓励母亲接受养育儿童的培训，他认为这个措施是个很好的借鉴。参会人员也提出了城镇化过程中，户口转变会改变城乡受教育水平的问题。Rozelle 教授认同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会在短期内提高原来农村人群的受教育水平，因为这些农村人口能够接受城市学校的教育，但是他怀疑这种做法在长期和大范围的提高农村人群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作用。另外，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关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以及关于中国的文化特色如何对儿童养育的行为造成影响，他都做出了详细的回答。

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教授谈长期健康保险



北京时间 2021 年 3 月 29 日 10 点，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教授受我院暨南论道活动邀请，于线上平台进行了题为“Long-Term Health Insurance: Theory Meets Evidence”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由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

方汉明教授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会士 (Fellow)，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研究员，并于 2014 至 2016 年担任中国经济工作组代理主任。他是人口研究中心和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伦纳德·戴维斯卫生经济研究所 (Leonard Davis Institute of Health Economics) 高级研究员，以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他还曾担任新南威尔士大学澳中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科学主任，新加坡亚洲经济和金融研究局高级研究员以及德国 IZA 研究员。他曾任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等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联合编辑，目前是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的资深编辑，也是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0-2024) 编委会成员。方汉明教授注重理论和实证的紧密结合，研究课题涵盖歧视等社会经济问题心理与经济、福利改革、拍卖、健康保险市场和人口老龄化。他在医疗保险市场方面的研究获得了第 17 届国际卫生经济学会 (iHEA) 颁发的最佳健康经济学肯尼斯·阿罗奖 (Kenneth Arrow Prize)。

方汉明教授在本期暨南论道讲座中分享了一项他的合作研究。他首先指出，当前私人市场常出售的短期健康保险使投保人面临潜在的巨幅保费波动（即重分类风险），从而导致福利水平的显著降低。政府管制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缓解投保人风险，但也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相比之下，长期健康保险只在登记之初确定风险评级，且不再随投保人健康状况而调整保费，通过跨期激励机制确保了个体能尽早购买保险、锁定保费，在降低重分类风险、确保市场参与的同时消除了逆向选择问题。

长期健康保险在全球的实际应用较少，德国作为世界上私人长期健康保险市场最大的国家，有超过 10% 的人口 (880 万人) 持有私人保险公司出售的长期健康保险。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德国健康保险市场，探讨长期健康保险的福利问题。具体来说，研究首先介绍了 GLTHI (德国长期健康保险) 的主要原理和功能，并阐明其内源性流失的理论基础。然后利用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理赔面板数据及德国 SOEP 调查数据来估计衡量福利水平的关键要素：健康风险变化和生命周期收入概况。研究设计出新的风险分类方法，并据此估计并比较 GLTHI 与其它类型健康保险的福利状况。

研究发现，GLTHI 的福利水平比短期保险更高，通过消除重分类风险来补偿前期较高保费负荷导致的福利损失。研究结论对不同的风险规避程度、跨期替代弹性、Epstein-Zin 偏好以及生命周期收入状况都是稳健的。对于极低和极高的风险规避程度，GLTHI 的福利将趋同于最优合同下的福利。此外，研究还解决了长期合同与医疗保险现收现付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将工龄期间长期合同与老年医疗保险相结合，是一种优于现状但不如终身长期合同的替代方案。

讲座结束后，方汉明教授与参会人员积极互动，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长期健康保险的道德风险及未能推广的具体原因等进行了详细解答，会场气氛热烈。

数据调查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第十七期：在华外国人调查实践

主讲人：梁玉成，中山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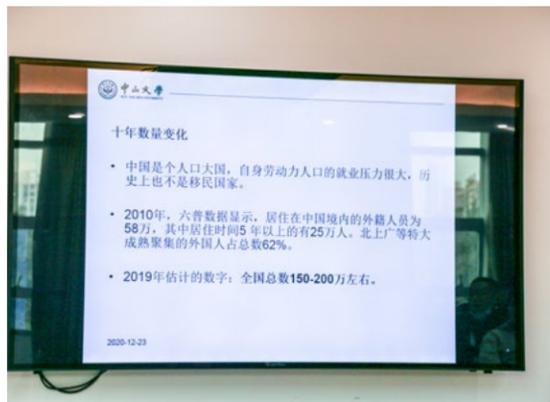
梁玉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副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承担社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其研究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新世纪优秀人才，青年长江学者，“四个一批”理论领军人才，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入选“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治理、在华外国移民、计算社会科学。

关于在华外国人调查的经验、发现和研究成果，为在座师生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社会、理解移民政策而提供了观察窗口。

讲座伊始，梁玉成阐述他对在华移民的研究，始于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的思考。梁玉成表示，早年的学术交流让他认识到，外国移民对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缓和人口老龄化有着积极意义，但对这一群体的社会治理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具体、明确、科学的方案。因此，在华外国移民研究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和长期研究价值的学术方向。

应社会调查中心的邀请，中山大学梁玉成教授来暨南大学石牌校区作线下专题讲座，分享其从2011年至今

谈到在穗外国人时，梁玉成介绍，早年迁入广州的主要是非洲裔移民，他们主要从事商贸活动，而未真正进入本地劳动力市场。随着外国移民的增加，广东非法外国移民的主要构成群体逐渐变为越南人和缅甸人，并且他们进入了国内劳动力市场，主要从事基础农业种植和高强度的加工工作。但因为这两个群体外表与本地居民区分度不大，所以社会公共感知仍停留在“非洲人为在穗移民主要构成群体”的印象中。



梁玉成指出，这十年来，在华外国人群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也有了一些变化。其一是华人回国定居显著增加，“落叶归根”心理主导了迁徙行为，其二是市场经济导致的区域竞争为不同阶层的外国人提供了发展机会，促使不同阶层的外国人迁入。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增速和融入速度都高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

讲座的后半部分，梁玉成主要通过在华外国人调查的数据，分析移民网络的内部和外部形塑机制。在其最初研究在华非洲裔移民时，由于受访群体绝对数量较少，且难以确认位置，梁玉成便采用了道格拉斯在1996年提出的同伴推动抽样方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 RDS），分别在广州和佛山开展面对面访问，最终共完成了问卷700余份。



基于多年的调查，梁玉成指出受访的外国人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人士。非法外籍劳工以男性为主。对于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而言，随着移民群体扩大及社会资本上升，移民成本下降，这验证了在华外国人移民过程存在累积因果效应。数据显示，对移民的基层治理既维持了社会秩序稳定，也促进了移民快速融入我国社会。

讲座的最后，梁玉成分享了他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解。他指出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发展，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而西方学术范式及选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学者对西方社会发展的焦虑。因此中国学者在进行社会学研究时，应更多关注本土问题，不要一味追求机械地应用西方学术范式，要关注中国社会独特性，在积极与世界对话的同时，诠释好中国故事，建立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第十八期：健康行为调查的挑战与经验： 以毒品滥用和性行为研究为例

主讲人：缪佳，上海纽约大学



缪佳，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纽约大学社会学系特聘助理教授，入选上海“青年东方学者”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健康不平等、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调查方法。参与过多个大型社会调研数据库建设项目，包括上海都市社区调查、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生活调查、健康和健康行为调查等。

应社会调查中心的邀请，上海纽约大学缪佳教授担任“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18期主讲人，与线上会议间的师生分享其长期在社会边缘群体开展实证调研的经验和关于毒品滥用问题的研究成果。

讲座伊始，缪佳介绍，关于健康行为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多时候会关注边缘群体及其暴露和引发的社会问题。边缘群体中一部分因其行为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而被歧视或污名化，一部分则因其违法行为而试图遮掩生活痕迹。污名化和信任缺乏导致该群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接触。因此，在开展针对这些人群的调查研究时，研究者难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抽样框，难以与样本建立信任合作关系。

随后，缪佳以正在进行的毒品滥用和性行为健康风险研究项目为例，阐述其应对上述问题所做的调研工作。



在谈到项目缘起时，缪佳指出我国有一定规模的毒品使用者，而既往相关研究中，毒品滥用成因研究多集中于西方社会和青少年群体，没有对毒品进行分类研究，而毒品滥用及其导致的高风险性行为研究则多集中于特定群体，整体缺乏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支持。因此在中国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制定预防毒品滥用的政策，又能推进相关基础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设计抽样方案时，缪佳分析，自2014年国家将禁毒工作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以来，我国对毒品进行严格管控，并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区戒毒与康复系统。这为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毒品使用者样本提供了基础。

在调查中，缪佳所在的研究团队分别选取使用合成毒品为主和使用海洛因为主的两个城市，以社区为基础，通过同伴驱动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分别在毒品使用者和普通居民中进行抽样，开展问卷调查，同时采集生物样本，以获得翔实的样本数据。

缪佳认为，在收集隐蔽性人群信息时，定向目标抽样法耗时耗力，滚雪球抽样难以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因此，以上两种方法并不是最适合毒品使用者群体的抽样方法。而同伴驱动抽样法可以在较少的成本下，生成一定区域内有代表性的样本库。



而谈及高质量数据采集时，缪佳分享，项目主要依托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采取基本问题访问员提问和敏感问题受访者自填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场所一般设置在社工站办公室等。这些安排能有效地保障受访者的隐私信息，因此受访者更愿意如实回答敏感问题，数据质量也更高。

根据现有数据，缪佳解读，自2014年起，随着娱乐文化的兴起，合成毒品使用者代替传统海洛因使用者成为毒品滥用的主要群体。追求感官刺激的人群可能更容易使用毒品，甚至滥用毒品。缪佳认为，毒品问题的研究需要关注文化冲击的影响，禁毒工作不仅要对个人使劲，还要从社会层面上加强文化宣传倡导，合理利用社区的邻里约束等多层次手段，来更好地维护社会良性、稳定运行。

第十九期：后新冠时期的电话调查技术与方法

主讲人：王卫东，中国人民大学



王卫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卫东拥有丰富调查经验，同时担任了世界民意研究协会 (WAPOR) 中国国家代表、国际社会调查合作项目 (ISSP) 中国协调人、东亚社会调查 (EASS) 项目中国代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项目负责人、中国人宗教态度与行为调查 (CRABS) 项目负责人、中国宗教调查 (CRS) 联合负责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项目共同负责人、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 (CNSDA) 执行主任等，也是跨平台调查软件 OmniSurvey、云电话调查系统软件 OmniCATI 的作者。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健康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社会网络分析、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3月19日，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举办了“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19期，也是本学期第一场的调查主题讲座。应中心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王卫东副教授担任主讲人，与线上会议间的师生分享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通过电话调查进行调查数据采集的实践经验与思考，并尝试探讨电话调查的创新和拓展方向。

讲座伊始，王卫东从目标总体覆盖率、数据质量、应答率等指标对比了入户面访、电话调查、网络调查和邮寄调查四种主流调查方式在当下社会背景中的适用性。他解释，新冠疫情的暴发给调查数据采集工作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如无法开展入户访问、电话调查中心因疫情防控政策关闭、访员招募难等，促使调查团队在调查手段上创新以解困。

相较之下，电话调查较入户面访开展成本低，地理限制少，且目标覆盖率和数据质量与面访差距不大，是疫情防控期间可实行的、较好的调查方式。在疫情前，尽管电话调查在中国有着高电话覆盖率、低通信资费、较完备的移动电话号码抽样框等国情优势，但碍于设备门槛高、运维成本高、访问员招募难等原因，实际并没有得到更为广泛地应用。

主要调查方式的对比

	成本	数据质量	目标总体覆盖率	应答率
面访	高	高	高 (理论上)	高
电话调查	中	高	高 (93.5% 18+成年人)	中
网络调查	低	低	中 (64.5%)	低
邮寄调查*	低	低	低	低

随后，王卫东介绍了OmniCATI云电话调查系统和“数据蜂”计划。这是他所在团队在疫情期间关于电话调查的两大实践探索——搭建云呼叫中心和采用众包组织模式，可以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访问员通过网络访平台开展电话调查。这两项调整突破了传统电话调查中心的地理局限，并有效地弥补电话访问员短缺，对疫情时期如何开展社会调查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通过过去一年电话调查的实践和分析，王卫东指出，移动电话调查基于手机号段进行抽样，因此确定抽样框时需要注意手机异地使用、号段密度差异和用户特征差异等问题。而调查主办机构、问卷内容、酬金说明时机、访问员性别、访问时段等因素均会不同程度影响调查应答率，因此开展电话调查时可从这些因素着手调整以提高应答率。

讲座的最后，王卫东简要谈到关于调查技术平民化的构想，并积极回答了会议间师生提出的问题。双方互动与踊跃探讨进一步启发了听众对电话调查的深入思考与认识，实现教学互促。

学生天地

学子风采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吴宁华： 很幸运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人物名片

吴宁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019级），现已入职腾讯游戏。

对于吴宁华来说，留学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学习与工作的平衡，如愿入职腾讯游戏的他，回想起自己在“麦屯”的日子（麦屯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校址的简称），言语中依旧充满怀念。如果给这段经历一个概括，他的回答是“热爱藏在生活里”。

偶遇改变一生

某年假期，吴宁华的舍友参加了 IESR 主办的“广东千村调查”调研活动，从他口中，吴宁华得知了 IESR 的存在，“那个时候才了解到暨南大学本部原来还有一个这样的学院”。转眼就到了申请季，看到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项目，早有留学打算的吴宁华“稍作考虑就报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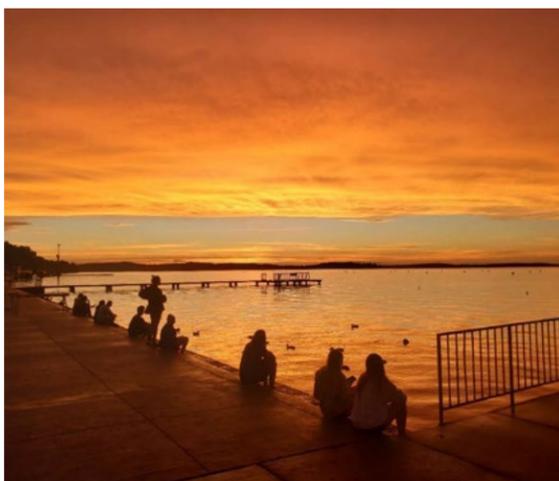
吴宁华把预科班学习的这段日子当成了“一种安逸快乐的生活体验”。由于本科没有系统学过计量经济学课程，吴宁华认为预科班的课程帮他很好地弥补了这一弱势，而且对之后留学的课程衔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享受生活本貌

吴宁华成功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录取后，“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也就此开始。“麦迪逊的春夏秋冬都很美，生活节奏很慢，很适合静下心来做研究和享受生活。”吴宁华回忆道。提起学校，他的眼里满是喜悦与自豪：“学校基本上具备了学生阶段能想到的所有学术资源，像商学院的各类企业行业数据库、各学院的期刊数据库、经济学院每周的会议、图书馆馆藏等都对学生全部开放。”



图书馆



夕阳美景

“课程选择非常自由。”吴宁华介绍道，“除了基础课程外，其他课程全看个人的规划与兴趣。”正常情况下，像他一样的留学生们几乎可以选择商学院、数学学院、统计学院、计算机学院等学院的所有课程，实操起来，吴宁华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麦迪逊经济学院的老师和 TA 水平稳居经济学 PhD 项目前 15，在此之前吴宁华就了解到，这儿已经在北美经济学博士申请圈子里有一定知名度，“是比较著名的 PhD 跳板学校”。

他亲切地把麦迪逊称为“麦屯”，谈起自己待在屯里的感受，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时间好好去思考到底想做什么，第一次在学习、生活和规划未来之间找到了平衡”。虽然他早些时候就坚定了回国工作的想法，但他依旧把留学生活过得很精彩。经济学院的必修课总体来看课业压力比较大，但好在考试难度适中，属于“好好学就能得到不少收获”的范畴。期间，他认为与助教和老师的 office hour 以及每周的讨论课都是十分重要的学习资源，吴宁华在课业上的很多问题都能在这些学习交流过程中得到解决。吴宁华感慨，这里跟国内课程设置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课程的高度体系化：“教授的课件和 TA 每周的讲解都配合得很好，每一节课的目标都很明确，尤其是对想申请 PhD 的同学来说是非常好的打基础的机会。”

除了学业这条主线，吴宁华在屯里的小生活过得也轻松自由。他找了一份咖啡师的兼职，跟主管学拉花，空闲时就跟其他同事闲聊趣事，“每周的这八个小时是一周里我最期待的时间之一。”在他看来，屯里的大家都很朴实，这种纯粹简单的生活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单纯的学习和悠哉生活带来的无尽快乐”。



冰雪中的“麦屯”

遗憾的是，因为疫情，这种生活吴宁华只体验了九个月就结束了，咖啡馆没再营业，昔日的美好时光都留在了他的朋友圈里。如今提起，吴宁华感慨“真想多待一年”。

向着目标前进

关于就业，吴宁华目标明确，早早地为此做好了准备。“在留学期间我尝试了美国一些公司的面试，也跟很多学术大佬们认真研究过美国各大 PhD 项目。”吴宁华腼腆地笑了笑，“面试有回音，成绩也还不错。”，这些经历都增强了他对回国找工作的信心。他的秋招在 2020

年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画上了句号——2020 年，他作为商业分析师入职腾讯游戏。他认为自己感到了阶段性满足，“平台、业务模块和工作职能都是我最满意的结果。”

吴宁华希望师弟师妹们“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他认为人生很长，目标与沿途的风景都很重要，暂时没有目标也可以努力寻求生活中的平衡。他在毕业规划方面也给出了经验：“决定工作，就要做好信息收集工作；决定在学术方面发展，就把内容学踏实。”如今，吴宁华希望自己能在未来几年好好修炼“内功”，少说多做，“能对市场真正有所洞见”。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刘睿智： 成长就是在点滴中超越昨天的自己

人物名片

刘睿智，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就读于新加坡管理大学 (SMU) 2020 级。

“作为一个本科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去相关专业留学还是挺难的。”刘睿智坦言，在一年前，他没想到自己能成功被新加坡管理大学 (SMU) 录取，实现自己的留学梦想。



SMU 校园

小白的进阶路

刘睿智一直以来都有留学计划，作为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刘睿智最初并没有跨学科申请的信心。得知 IESR 海外硕士留学项目对本科专业背景不设限，并会有预科班进行全英文经济学课程授课，他便坚定了自己想要报考 SMU 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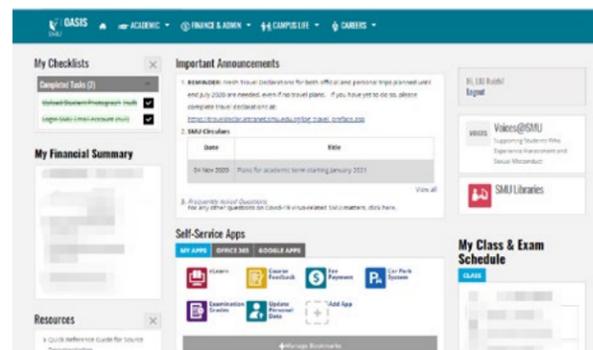
对刘睿智来说，预科班是一个很好的过渡。作为本科没有经济学背景的学生，这些课程不仅帮助他奠定了经济学基础，也让他开始有能力和底气去探究经济学问题。起初，他并不能完全适应全英文教学的预科课程，幸运的是，预科班的老师们很有耐心，“有了老师们的讲解与指导，我的学习主动性及学习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更难得的是，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刘睿智回想自己的奋斗时光，露出了笑容。

自律才能自由

在 SMU 留学期间，刘睿智感觉最舒心的体验是可以自主获得大量信息。他介绍说，SMU 的综合线上服务系统 OASIS (Online Access to Student Information System) 和学习网站 elearn 是提供给学生自主使用的，“学习上的有任何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刘睿智在 SMU 的课程比较紧凑，课程学习也不是他想象中那么简单。全英文教学加上三小时制课程设置，在密集的知识冲击下，他很难完全理解课程。好在出国前他接受了 IESR 预科班的全英文课程培训，SMU 的授课教授也会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以确保同学们都能跟上进度。

让刘睿智感触最深的是，他发现平时的图书馆很难占到位置，“学期末图书馆却空空如也”。大家用功在平时，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复习，大大提升了学习效率。“自律的学习之路才是快乐的”，刘睿智逐渐接受了这种学习模式，在平时的课程中，刘睿智积极与同学、教授沟通，提高学习效率，期末也变得不那么紧张了，“我可以做更多想做的事，这就是自律的好处。”



OASIS系统

独在异乡为异客

刘睿智的留学生活成本中最主要的花销是租房，其次是饮食。“租房选择多种多样”，刘睿智向我们一一介绍，“有学生公寓，也有组屋，价格一般在 600-1500 新币之间”。独在异乡，衣食起居都要自己负责。在新加坡的这一年，刘睿智的生活自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而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自理能力的提高又为他创造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不过在日常饮食方面，刘睿智坦言自己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虽然在新加坡汉语畅行，但官方语言还是英语，起初他在购买商品、点餐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自己不认识的词汇。“有段时间我一度抵触尝试新的菜品。”当被问到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刘睿智笑了笑：“店员会耐心讲解，大胆问就对了。”鼓起勇气沟通之后，他品尝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美食。

除此之外，刘睿智就读的 SMU 位于新加坡市中心附近，环境优美，交通也十分便利。就如他介绍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不过仍然要做好基础的自我防护工作。”刘睿智提醒道。



新加坡市中心夜景

回国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由于疫情原因，新加坡对外来人员的就业政策进一步收紧，就业形势并不那么乐观，但刘睿智依然有很多锻炼自己的机会，“有很多大厂的实习岗位是向我们开放的。”

谈及未来，他希望空余时间能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实习工作来积累经验。“想实现经济独立。”刘睿智这样答道。目前来看，疫情下的海外并不乐观，考虑到家庭、社会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因素，刘睿智直言自己更倾向于回国发展，“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钟惠巧： 挑战自我，跳出舒适圈

人物名片

钟惠巧，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就读于美国德州 A&M 大学（2019 级）。

从中国广州到美国德州，从害羞到健谈，留学坚定了钟惠巧的求职选择和为金融做贡献的决心。为什么选择了 IESR 预科班？海外留学生的日常是怎样的？什么促成了她个性的沉淀与转变？钟惠巧为我们带来了她的故事。

多做准备才能少走弯路

钟惠巧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多做计划、多做准备，尤其在准备留学时。申请学校的流程像一道横亘在她与理想之间的墙，面对这些困难，钟惠巧坦言，自己参加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就是为了“步骤清晰、少走弯路”。

语言是留学路上难越的大关，钟惠巧也曾对此望而生畏，她感慨是老师们帮助她跨越了这道难关。钟惠巧说，自己能够适应这种全英的教学模式，多亏了在预科班中一次次的预演与突破。预科班英文听说读写的练习，让她逐渐消除了用英文表达的紧张与恐惧，钟惠巧表示，“阅读与写作能力也有了质的飞跃”。

真正到了异乡开启求学路后，提前做计划的习惯再一次帮助了她。由于国外学校对于学生就业的重视程度很高，刚入学就有“新生必须参与招聘会”这类硬性标准，

彼时，她早已准备好了自己的简历。于她而言，参与就业招聘会变成了一场有准备的演练，也是一次开阔眼界的大好机会。钟惠巧直言，“不论继续深造还是进入业界，提前准备、做好规划才能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在喧闹夹缝中自我沉淀

谈起在美国德州 A&M 大学 (TAMU) 的学习与生活，钟惠巧感慨一切都历历在目。虽然疫情严重，她未能如愿进行自己筹备已久的旅行计划，但这段日子依然是她心中难以忘怀的时光。对于留学生群体而言，融入新环境固然困难，但学校雄厚的教师资源与活动指导，以及协助处理国际生事务的 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都给了她很多帮助。“有很多可以锻炼自己的机会，还有定期的写作指导、就业咨询和招聘会。”钟惠巧感慨，“学术上也一样，除了本系的老师，其他系相关的教授也乐意给我们解惑。”

位于德州大学城 TAMU，毗邻休斯顿和达拉斯，就像闹市中的小乡村，虽然并不繁华，但生活成本低。德州大学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公共设施都以学校为中心而集聚，免费的校巴路线已经足够覆盖钟惠巧的日常生活区域。钟惠巧认为这里“民风淳朴，快递放门口都不会丢”，生活很清静、自在。虽然附近的实习机会不算多，但去临近大城市的车程只需两小时，独自出行也相对较安全。

即便如此，留学生活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插曲，在疫情期间，自己住在出租屋里，有时也会有些孤独。“至少我学会了照顾自己。”钟惠巧笑道，“有的时候独处是为了更好地提升。”



TAMU 校园风景

在舒适圈之外再展望

独自求学的女生本就生活得小心翼翼，钟惠巧也一样，交流问题成了她独处之余的大事。在非母语的环境中，一开始她不好意思主动开口，因为经常有“听不懂或者不会表达的尴尬时候”。为了更高效地融入环境，钟惠巧开始强迫自己跳出舒适圈，减少与讲中文的留学生共处的时间。“说得多了才能自信”，她给自己立了很多 flag，如“参加英文 workshop”、“参与其他的学习交流活动”、“结交新朋友”等。与此同时，校内的课程也提供了这种交流的机会，钟惠巧在小组合作中不断摸索着自己的定位：“与人沟通是必要的，从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学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最后，她不仅能够熟练地运用英文进行公众汇报，也习惯了更多元的思维方式，对不同思想文化的也有了更多理解与包容。



课上模拟市场交易

如今，钟惠巧打算回国就业。“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赚钱。”她眼神坚定，“也希望自己能在金融这方面有所贡献。”

IESR 2021 年海外硕士预科班正式开课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正式开课了！3月6日，参与 2021 年海外硕士预科班的同学们在 IESR 迎来了第一节全英文计量经济学课程。



IESR 助理教授林威授课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海外硕士预科班一共与 5 所大学合作，包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待参与学生完成所有预培养课程，通过考核，并达到海外高校要求的语言成绩后，则可于 2021 年秋季学期或 2022 年春季学期正式入读所选择的海外高校。

IESR 林威老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负责本学期计量经济学授课。“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能够动手操作 STATA 软件，并能在修完全部课程后打下坚实的基础，顺利衔接海外课程。”林威老师在课前对该课程的要求进行说明。在随后的课程中，林威老师结合丰富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个个专业术语，循循善诱，吸引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



同学们在课上认真听讲

李刘洋是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学生，他希望通过修完本次预科班能够前往美国德州 A&M 大学继续深造。他认为，林威老师的课程清晰易懂，便于他在全英学习的过程中打好基础，更好地为未来的海外课程作准备。

李金阳是暨南大学大四的学生，在参与本校课程的同时，周末兼顾海外硕士预科班的课程。一整堂课下来，李金阳对老师的授课风格和授课内容十分满意，并对未来前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学校深造充满信心。李金阳之所以选择 IESR 的海外硕士预科班，不仅仅在于合作的学校知名度高，还因为可以得到和授课老师一起做研究项目的机会。在上学期，李金阳就参与了“独生子女”的项目，在其中体验了一把做研究的全流程，同时锻炼了撰写文献综述的能力。

本学期，海外硕士预科班从线上转为线下与线上相结合授课，同学们在与老师面对面的授课过程中获得全新的体验。相信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以及同学们的不懈努力下，参与学生都能够顺利踏上海外硕士的圆梦之旅。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中信建投资本高级副总裁徐佳伟谈金融行业职业规划



3月27日上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珠江经济学俱乐部活动第13期暨职业发展系列讲座第2期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406室顺利举行。中信建投资本高级副总裁徐佳伟受邀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关于职业规划的精彩讲座。此场讲座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中信建投资本高级副总裁徐佳伟

“所有成功的人都是努力的，但不是努力的人就能成功。”徐佳伟在讲座伊始，就向同学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理念，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选择”对的方向往往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对于尚在校园里的同学们来说，如何才能作出对的选择呢？徐佳伟先向同学们介绍了金融行业的基本格局。他认为，同学们在作出职业选择时，不能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银行、投行，而是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从整个金融市场的基本格局入手，找准自己的定位。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同学们既要既要关注买方市场又要关注卖方市场，既要关注一级市场，又要关注二级市场。从职能的角度来看，则要明晰所处的金融机构是掌握资金、项目的“话事人”，还是负责中介工作的“沟通者”。

徐佳伟在讲座中不时提及，“如果可以，工作最好是一步到位。”他鼓励同学们在进入职场前一定要做好准备。金融行业风起云涌，时间和年龄往往是最大的资本，很少有试错的机会。因此，他认为同学们在作出职业选择时，要一脚就踏进以后期望深耕的领域。即使没办法一下子就进入心仪的机构也不要紧，可以通过“迂回战术”，慢慢靠近。

以半导体为核心的通信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是徐佳伟建议同学们关注的两大产业。基于多年的从业经验与敏锐的观察力，徐佳伟认为金融行业正进入一个触底反弹期，“金融的本质是为实业服务，金融会被新的增量市场带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因此，他建议同学们时刻关注核心产业，抓住进入未来十年、甚至是二十年最大的入场机会。

讲座最后，徐佳伟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向同学们介绍了就业市场对商科学生的能力要求，传授如何修炼一身“武器”，让自己具备竞争优势。

为了让金融机构一眼就识别出你是有潜力的人，需要具备信息搜索能力、分析能力、研究能力、做材料的能力、数据推导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六大能力。

徐佳伟将做金融比作刑侦办案，两者都具备明确的目的，刑侦是抓住罪犯，而金融是为了获得收益。也就是说，当同学们在锻炼这些能力时，也需要关注实事、落到实处，关注外部新事物，学会研究热点事件，而不是走马观花。

在同学们的热烈提问中，本次讲座也迎来了结尾。本期活动主持人 IESR 陈思宇老师给此次讲座进行总结。她认为，“每一条成功的道路都是相似的，无论是进行科研，还是进入金融行业，选择哪一条路都要结合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并且集中自己的努力，坚持才是王道。”



讲座现场，同学们与徐佳伟热烈交流

未来，IESR 还会继续举办职业发展系列讲座，邀请多位业界“引路人”，帮助同学们提前做好职业规划，顺利踏入职场。

图说

